

温州 史志

W E N Z H O U S H I Z H I

2021年第4期
(总第137期)

主办：中共温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温州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

■ 10月9日，时任副市长张健赴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志办）调研指导温州市地方志工作
（周铁炯/摄）



■ 11月29日，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志办）主任王文胜与温州日报报业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图片来源：温州日报）

■ 12月16日，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志办）在市人民大会堂召开全市史志系统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宣讲培训会
（周铁炯/摄）



温州史志

WENZHOUSHIZHI

存史

资政

育人

2021年第4期
(总第137期)

■ 学习思考

- 03 深刻领悟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
以正确党史观指导新时代党史工作 王文胜

■ 党史研究

- 07 红军挺进师以泰顺为中心区域开辟浙南游击根据地的历史事件评析 陶汉心 赵晓爱
- 18 浅论梅山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地位
中共瑞安市委党史研究室

■ 志鉴交流

- 25 周去非《岭外代答》的地方志属性 张声和
- 36 论地方志鉴文本信息化的“三部曲” 任瑾洛
- 43 试论如何将地方志融入高中教育教学研究
——以温州地区为例 谭桂涛

■ 体会感悟

- 50 永远跟党走 刘锡荣
- 54 冰天雪地祭英雄
——电影《长津湖》观后感 彭松生

■ 历史人文

- 58 陈经正、陈经邦生平事迹考 陈 彤
- 64 旗杆内没白身人
——北港南湖黄家旗杆石的前世今生 陈盛奖

目录 contents

■ 岁月回眸

- 68 激烈的温州抗日巷战

王长明

■ 革命人物

- 72 生而为英，死而为灵

——刘英传略

- 84 粉身碎骨向光明

——李得钊传略

■ 志说温州

- 91 雁山瓯水 温润之州

中共温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 诗意温州

- 95 孟楼还是浩然楼？

尤豆豆

封 二：图片报道

封 三：毛泽东《念奴娇·昆仑》陈祖棣（书）

封底篆刻

蓝 潮



2021年第4期

（总第137期）

主办单位：

中共温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温州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

《温州史志》编委会：

主 任：王文胜

副主任：赵万磊 魏仕阔 吴 华

张声和 张致光

委 员：张林洁 郭东升 周婷婷

厉 靖 陈 好 康丽跃

金 默

主 编：王文胜

执行主编：吴 华

副主编：张林洁

责任编辑：陈 静 李 亮 饶晟吉

校 对：杨建明

地 址：温州市行政中心一号楼

电 话：88968780

传 真：88968777

E m a i l : chenj@zjds.org.cn

邮政编码：325009

出版日期：2021年12月

刊 号：浙内准字第C044号

印 刷：温州市北大方印务有限公司

深刻领悟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 以正确党史观指导新时代党史工作

◇ 王文胜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对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作出全面总结。这是郑重的战略性决策，使全党同志从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我们学习全会精神，就要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加强思想引导和理论辨析，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这也是做好新时代党史工作的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了解历史才能看得远，理解历史才能走得远。”了解党的历史，就是要知道党的历史是什么；理解党的历史，就是要明确对党的贡献怎么看。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95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是中华

民族发展史上不能忘却、不容否定的壮丽篇章”。怎么看党的历史，要树立鲜明的态度，就是“不能忘却、不容否定”。古人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灭亡一个国家，必定要让他们和人民完全忘掉过去的历史，以毁灭他们的精神和意志。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苏联当时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混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这带给我们的启示就是，我们决不能自己忘记自己的历史，也决不能让别人否定我们的历史。

第一，要以整体观点看待党的历史，不能彼此对立和割裂。《决议》把我们党的百年历史分成四个时期，这四个历史时期是以连续的方式出现

的，是一个接着一个、上一个为下一个做准备，不能割裂开来。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但党是正确认识不同历史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从而准确地制定历史任务的。比如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主要矛盾是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的矛盾，这两大矛盾决定了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两大历史任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使中国成为独立、自由、民主、统一的国家，这就是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的根本社会条件。《决议》分别总结了党在每个历史时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作的贡献，第一个时期是“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第二个时期是“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第三个时期是“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第四个时期是“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这些成就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上一个成就是下一个成就的必然要求和必要条件。经过这四个时期党和人民英勇顽强的奋斗，中国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党的百年光辉历程给了我们坚定的底气和自信。

第二，要正确把握各个历史时期的历史关系。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不容否定，但对历史上的曲折和错误持什么样的态度？我们就要看构成历史的主流。总体上成就是第一位的，失误和曲折只是局部、暂时的。即使对历史上某个犯严重错误的时期也要具体分析，只能对错误本身加以否定，而不能对那段历史全盘否定。所以要正确理解各阶段的历史关系，特别是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之间的关系。因为发生过“文化大革命”的失误，曾经在社会上出现过有人用前者否定后者，也有人用后者否定前者的情况，但无论否定哪一个，都是对我们自身历史的否定，这是我们要坚决反对的。要充分肯定各阶段的历史贡献，必须坚持两个观点。一是不能把这两个历史时期对立起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二十多年建设的

基础上开创的。”邓小平同志也在改革开放初期反复强调：“现在我们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都表明这两个历史时期是相通的。二是要区分作为政治运动的“文化大革命”与“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历史时期。《决议》明确“文化大革命”运动是错误，是内乱，要彻底否定。但是我们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运动和“文化大革命”那十年的历史区分开，不能混为一谈。我们否定“文化大革命”运动，但是不能说党在那段历史时期没有领导人民创造成就，在这十年时期，我们也创造了很多成就。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运动，我们的事业会取得更大的成就。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我们党对自己包括领袖人物的失误和错误历来采取郑重的态度，一是敢于承认，二是正确分析，三是坚决纠正。”忽视或者掩盖错误本身就是错误，但忽视或者否认取得的成就和成功经验，同样是严重的错误。

第三，党和人民在百年奋斗的实践中取得的根本经验是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

路。回顾党的百年历史我们可以认识到，由于找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中国革命最终取得了胜利；由于找到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也就是由于有了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我们党才有了今天的辉煌。我们可以从党在温州百年的非凡历程中感悟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和实践力量。在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左”倾错误思想的指导，浙南的革命斗争遭受了严重损失。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特别是在党的七大上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以后，我们党才最终成熟，浙南的革命斗争在党的领导下也从逐步取得胜利，达到真正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党找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也经历了很多的艰难曲折，“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们党深刻地总结了经验教训，重新走上了正确的道路。在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中夺取新的胜利，必须始终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

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路子走下去。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

党史工作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项具有全局意义和深远影响的工作。作为党史工作部门，我们要学深学透、系统理解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把贯彻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集中反映到党的历史中，记载到党的文献中，体现到宣教和资政服务中。一要坚持“党史姓党”的政治原则，树立正确党史观，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二要坚持资政育人的主要任务，坚持党

史研究和服务现实相结合，在职能上努力从“记录”向“编研”转变，在资政上努力由“配角”向“主角”转变，在成果转化上努力由“单一”向“综合”转变。三要坚持守护“红色根脉”的职责使命，发挥红色优势，激发红色动力，把革命精神、改革精神诠释好、发扬好，拓展牢记红色历史、传承红色基因的通道。四要坚持育才赋能强基的工作导向，加强高素质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全面提升干部队伍政治能力和业务能力，为党史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为我市“续写创新史、走好共富路”贡献党史力量。

〔作者单位：中共温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志办）〕

红军挺进师以泰顺为中心区域 开辟浙南游击根据地的历史事件评析

◇ 陶汉心 赵晓爱

从星火到燎原，从曲折到辉煌，泰顺革命事业之所以取得成功，离不开一支革命劲旅——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这支部队于1935年2月组建，同年4月进入泰顺，1938年离开，重燃了浙南革命烽火，使泰顺成为当时闽东苏区的可靠后方和浙南游击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在当时，泰顺全县近六成区域创成游击根据地，近三成的区域成为游击区。

红军挺进师在泰顺 开辟革命根据地的事件概述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泰顺境内的革命根据地是在中央红军进行长征、南方老苏区已经失陷、地方党组织和红军队伍基本上跟中央失去联系的历史条件下建立，并依靠特定的历史地理条件和领导人正确的斗争策

略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泰顺革命根据地因隶属关系不同，可分为中共闽东特委领导下的根据地和中共浙南特委领导下的根据地。以泰顺县现有的行政区划来看，县域西部、西南部、中部地区属中共闽东特委领导的根据地；东部、东北部地区是中共浙南特委领导的根据地。隶属浙南特委的这块根据地是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进入泰顺以后，以武装斗争为手段，以群众工作为基础，在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的直接领导下创建起来的。因为浙南党的主要组织和主要领导人在泰顺活动的时间相对较长且基层党组织也较健全，所以泰顺这块根据地是浙南游击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在当时，红军挺进师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推进泰顺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与建设。

（一）进行武装革命斗争。1935年4月至11月，红军挺进师在泰顺境内



闽浙边临时省委
成立旧址

相继开展了潭边战斗、百丈口战斗、袭击百丈口警察所战斗、可溪战斗等。这几次战斗的胜利，为红军挺进师转战浙南和选择在泰顺东南部山区扎根、开辟泰顺革命根据地等，创造了先决条件。1935年12月，新成立的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将闽东鼎平中心县委所属的鼎泰区单独划出，作为临时省委直属区。在挺进师和临时省委驻地——泰顺县九峰、峰文一带成立泰平区，同时成立中共瑞平泰县，下辖鼎泰区和泰平区。这是挺进师进入浙南（泰顺）以来的第一块根据地，自此，挺进师在军事上转为主动出击。1935年12月到次年5月，挺进师在泰顺境内取得了攻打里光基干队战

斗、白柯塆战斗、冥斋岩遭遇战、伙爬岭伏击战等重大军事胜利，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在泰顺的反动统治，也缴获了敌人大量的武器，进一步巩固了泰顺革命根据地的军事战略地位。1936年，活动在泰顺革命根据地内的武装队伍主要有3种组织形式：第一种是正规红军部队，即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这支队伍是在刘英、粟裕的领导下，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和较好的武器装备，是泰顺武装斗争的主力。第二种是地方武装部队，有县游击队、各区的游击队（肃反队）。它随着各县、区党组织的建立而建立起来，归属党委和人民委员会领导。第三种是群众自卫武装，如各乡村的赤卫队。

1936年底“西安事变”后，国民党当局对浙南地区展开“清剿”，刘建绪十万大军步步紧逼。为了粉碎敌人的“围剿”计划，1937年1月底，刘英、粟裕决定重建红十九师。红十九师组建后的第6天至第8天（即1937年2月5日至7日）发生了峰文战斗。峰文战斗的消息，曾被当年苏联《红星报》报导过，它是一次著名战斗，也是挺进师在闽浙边与敌作战中投入兵力最多的战斗。红军挺进师和新编红十九师投入兵力1100多人，国民党参战部队有浙保第二团、第三团和第八十四师的一个团，兵力总计3000余人。峰文战斗的胜利，对振奋浙南革命者的斗志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二）加强基层组织建设。1936年3月，中共浙南特委在泰顺峰文小南山村成立，在闽浙边临时省委和浙南特委领导下，泰顺革命根据地内的党组织迅速发展。1936年6月成立泰顺县委，到11月，挺进师在泰顺境内共发展有泰东北区委、泰东南区委，加上原先设立的鼎泰区、泰平区，共有4个区委在泰顺领导开展革命斗争。到12月，瑞平泰县委、泰顺县委在今泰顺区域内共发展了34个党支部，总计295名党员（不包括泰东北区委在泰顺境内发展的党支部数与党员人数）。

为了贯彻土地革命纲领、加快推进根据地政权建设，1936年8月，挺进师在鼎泰区排头村成立浙南人民革命委员会，接着相继成立了泰顺、瑞平泰等县级人民革命委员会及其下属组织。为更好地发动农村青年，根据地内普遍建立了共青团组织。其中，涉及泰顺革命根据地的县级团组织有共青团瑞平泰县委和共青团泰顺县委。此外，根据地内普遍建立妇救会、贫农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挺进师正是利用这些群众组织，加强了对群众的思想教育，对群众进行党的性质、宗旨、革命目标、革命依靠谁、团结谁、打倒谁等道理的宣传教育，启发贫苦农民回忆阶级苦和血泪仇。总之，挺进师凭借这些群众组织，调动了根据地内的人力物力，为开展革命斗争、军事斗争奠定基础。

（三）开展土地革命斗争。土地革命是地下革命斗争的基本内容和重要手段。1936年下半年，为了对付粤、桂军阀发动的“两广事变”，原驻泰顺及福鼎、霞浦等县的国民党正规军被调走，留驻泰顺的保安团和基干队不得不收缩战线，躲进各大据点。闽浙边的革命潮流旋即高涨起来。当时国民党《东南日报》曾这样报道：“驻泰顺的第十一师奉命调

走，红军乘机蜂起。”随着革命形势的好转，农民要求在深入开展“四抗”（抗租、抗债、抗捐、抗税）运动的基础上，再进行“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临时省委顺应革命形势发展，贯彻土地革命纲领，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比如中共瑞平泰县鼎泰区委发动福鼎上奥等村贫苦农民100多人，浩浩荡荡地前往泰顺峰文，分掉双溪口村地主的粮食，还发动泰顺月湖柘下村贫苦农民250多人分掉当地18户地主2.5万斤粮食。8月下旬，浙南人民革命委员会主席郑丹甫，在泰顺月湖东云自然村召开土地革命会议，确定了按两个步骤推进土地革命：第一步为登记人口、土地，没收地主、富农的青苗和出租的土地；第二步按人口分配青苗和土地。同时举办土地分配训练班，培训土地改革的骨干力量近70名。9月，瑞平泰县全面开展分粮斗争和土地改革，按人口分谷子和土地，群众热情高涨。下属的鼎泰区在泰顺境内的月湖、富垟、鹏山3个乡就分配耕地3463亩。此外，泰顺县人民革命委员会主席周钦明还率领游击队进入翁山等地，开展“打土豪、分粮食、分牲畜”的斗争。

（四）加强文化宣传工作。红军挺进师是一支英勇善战的武装战斗

队，也是党出色的宣传队。1936年，闽浙边临时省委和省军区，在泰顺先后发表了题为《为反对帝国主义增兵平津告全国大众书》和《告白军书》的告示，深刻批判了国民党军阀宣扬的“中国无力抗日”谬论，号召闽、浙两省广大民众为挽救民族危机奋勇战斗。接着，还发表《为抗日救国告闽浙两省各界人民书》，进一步宣传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方志敏在狱中写的几篇文章（即后来出版的《可爱的中国》），于1936年从上海带入泰顺，在党内、军中以及革命群众中间产生巨大反响。泰顺革命根据地的党员和群众普遍受到思想教育，增强了“爱阶级兄弟、爱党、爱我中华民族”的情感，树立起终生为革命事业奋斗的理想信念。另外，根据地内许多大小村庄的墙头和屋壁上都写上了“打土豪杀反动派”的标语，以简短明白的口号式用语宣传革命斗争。临时省委宣传工作者和革命知识分子还创作和翻印了大批革命歌曲，通过传唱革命歌曲，开展革命思想教育。主要曲目有《为了人民把苦担》《当兵就要当红军》《红军纪律歌》《送郎当红军》《白扇歌》《红军希望歌》《工农士兵歌》《冲锋歌》，在泰顺就地取材编写的歌谣有

《忙给红军做衣裳》《攻打五里牌》等。刘英还亲自动笔编写了《工农兵生活歌》《工农兵四季歌》《工农歌》和《贫农歌》，这些曲艺歌谣很大程度上活跃了根据地内的文化宣传工作。

经过上述努力，至1936年底，红军挺进师在泰顺境内开辟的革命根据地已臻至鼎盛。此时，加上闽东红军在泰顺境内开辟的革命根据地，泰顺全县革命根据地面积达1120平方公里，人口达92468人；游击区面积为630平方公里，人口达68940人。两项人口合计数占当时全县总人口数的95.8%（全县总人口按168408人计算）。

红军挺进师在泰顺 立足发展的原因

泰顺是红色革命的沃土。红军挺进师转战浙南、以泰顺为中心区域开展革命活动，通过开展武装斗争和加强根据地建设，有力推动浙南乃至浙江的革命形势发展。其间，也迎来空前的发展，部队从1935年秋转战泰顺时的两三百人，到1936年底鼎盛时的1500多人，这支远离中央红军的革命队伍，之所以能够得到迅速发展，其

原因主要有：

（一）泰顺具有深厚的革命群众基础。泰顺地处浙南边陲，百里岩疆。“当东南之冲，盗出入必由之”，泰顺人民自古以来就有很强的保家御侮意识和反抗侵略、反抗压迫的历史传统。泰顺县的红色革命历史悠久。早在1923年，就有泰顺籍青年林秉权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他在1925年返回泰顺宣传革命，组织救国会。1930年，泰顺发生了本县近现代史上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泗溪“青帮会”农民大暴动，人数达1500余人，连当时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都曾两次对其进行报道，影响重大。此次农民暴动遭到国民党当局的血腥镇压，进而激化县内的阶级矛盾，全县广大人民群众对国民党当局产生极度仇恨的情绪。1935年秋，红军挺进师转战浙南，其选择的立足点就在泰顺东南部山区，大致就是1930年“青帮会”农民暴动的区域。

（二）闽东红军的依托作用。泗溪“青帮会”农民暴动失败后，其领导人曾官遇、曾清连相继逃到闽东地区，走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道路。曾清连还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当选为闽东苏维埃政府的军事委员，闽

东红军由此高度重视向泰顺发展革命力量。1934年，闽东党组织相继从福安、柘荣、福鼎三个方向，按照三条路径，采取“波浪式推进”的办法，向泰顺发展革命力量。至1935年4月，闽东地下党组织下辖的霞鼎泰县委（县苏维埃）、福寿县委（县苏维埃）在泰顺境内建立了4个区委、4个区苏维埃，成立了岭上垵、万福青、横岗等10个乡苏维埃。与此同时，各乡还普遍组建农会、贫农团、赤卫队等组织。至1935年5月，泰南、泰东、泰城、排头4个区全部成立区游击队，队员合计170多名，并且掌握一大批枪支弹药。其间，闽东红军还在泰顺境内组织了攻打茂竹园碉堡和排头碉堡、拔除双路口村国民党民团据点等较大规模的战斗。同时，霞鼎泰县委、县苏维埃还派出大量工作人员，进入泰顺南部的章坑、后章、万排一带抓土豪，没收地主的财物。总之，闽东红军在泰顺的一系列革命活动，为工农红军挺进师扎根泰顺，创造了先决条件，起着依托作用。1935年秋，红军挺进师转战浙南，很快在泰顺找到立足点，并且迅速壮大，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有闽东红军的后盾支持。其中最关键的一点是得到闽东红军此前开辟的泰鼎区。红军挺进师

正是利用泰鼎区这一块重要基地，全力整顿党组织，开展革命活动，继而又在泰顺九峰、峰文一带开辟出新区——泰平区。

（三）正确把握有利的革命形势。主要是指把握住两方面的有利形势：一是正确把握与闽东红军“抱团取暖”“协同合作”的机遇；二是正确把握“两广事件”发生后的有利形势。1935年秋冬之际，针对闽东红军与挺进师都跟党中央失去联系、闽北红军领导人黄道不赞成恢复成立闽浙赣省委的实际情况，刘英当机立断，决定与闽东红军合作，于1935年11月7日，在泰顺九峰白柯垵，成立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并担任书记。同时，成立省军分区，粟裕任司令员，统一领导闽浙边区的革命斗争。闽浙边临时省委的成立，对于浙南和闽东红军共同反对国民党当局的“清剿”起到很大作用，也凝聚了红军将士的人心，为闽东与浙南地区的革命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1936年6月1日，“两广事变”爆发，蒋介石急忙把对付红军挺进师的王牌军——国民党第十八军调走，驻福鼎、霞浦的国民党军第九师一部和驻泰顺的第十一师一部也都在6月份相继被调到湖南，以应对“两广”军阀。闽浙边临时省委充分

利用时机，扩大浙南游击根据地，恢复和开辟了浙西南和浙东等游击根据地和游击点。至1936年11月，游击战争的范围到达闽浙的边界、浙江南部、金（华）衢（州）盆地以及台州的部分地区，共计30多个县，纵横200余公里。党员发展到3000余人，地方工作干部500多人，正规部队发展到1500余人，另外还有数千人的地方游击队和群众武装。1936年6月至12月，是挺进师进入浙江以来斗争环境最好、发展最顺利的时期。泰顺县国民党要员高宗龙所写的《泰顺“匪灾”日记》，称这段时间为“西南异动国军开拔回去，赣闽‘赤匪’进据内地、实施赤化时期”。据该《日记》记载：“‘两广事变’后到1936年12月的半年时间，全县共有442名反动分子被镇压或清算，县内反动势力因此受到沉重打击。”《日记》还记载此前的“‘赣赤’‘闽匪’合扰时期（1935年4月至1936年6月）共计一年零一个月，全县被清算或镇压的各类反动分子225名”可见，这半年间泰顺县内革命形势的愈加高涨。

（四）及时转变军事斗争的方法。红军挺进师是以擅长于正规战的原红军部队为基础组建的，原本不善于打游击战，其成员大都来自湘、

赣、闽等省，特别是进入泰顺之后，人地生疏，言语不通，生活更是不便。因此，开始时不少干部战士对打游击战存在畏难情绪。为此，挺进师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对部队的编制和干部配备进行调整，使之适应游击战的特点和需要。同时，为培养部队游击作战的能力，粟裕向叶飞领导的闽东红军学习，将挺进师部队分成若干小部，采取循序渐进的办法，让团级干部独立带领小部队分散活动，并将活动时间从三天增加至五天，之后再逐步延长。最后，排长、班长都能带领小部队进行单独活动，部队独立作战能力和游击作战能力都得到显著提升。1937年2月下旬，峰文战斗过后，粟裕率领部队由峰文转战三魁卢梨。国民党浙保第二团、第三团、第四团从戮州包抄上来，然而红军兜了一圈又从山上下来，再到戮州，像捉迷藏似的与敌人周旋。粟裕回忆这段经历说：“我们总结了兜圈子、大小圈、‘8’字形、电光形、回马枪、东去西返、早出晚归等许多方式，做到飘忽不定，出没无常，使敌人无法捉摸。”挺进师充分运用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成功冲出了包围圈，使得敌人企图消灭红军主力于泰顺的计划以失败告终。

（五）适时调整政治斗争策略。

峰文战斗过后，红军挺进师主力虽然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但也暴露了自身实力。此后，敌人加强了对泰顺革命根据地的攻势，斗争局面也愈发被动。为改变这样的局面，1937年2月下旬，刘英在泰顺县松垟乡天门下村牛童往的一户茅草屋里，召开了省委紧急扩大会议。会议认真分析了当前的局势，针对敌人的“大拉网”战术，红军决定在战术上采取与敌人相向对进、易地而战的打法；战略上，采取“化整为零”的方针，以连为单位，转到敌人的侧翼和后方打游击，或到敌人不大注意的地方隐蔽起来。牛童往会议及时改变了红军的斗争策略，对保护红军的自身实力和取得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具有决定性的历史意义。在反“围剿”斗争过程中，红军挺进师还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适时地调整对敌策略。闽浙边临时省委政治交通员吴毓从上海带回中央最新指示精神，于1937年3月25日，以闽浙边临时省委和省军区的名义给国民党闽浙皖赣四省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刘建绪、浙江省政府主席朱家骅、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等发了《快邮代电》，呼吁国民党当局应以民族利益为重，派代表与中共谈判。

正是在红军挺进师多方催促下，浙南国民党当局才被迫同意举行和谈，但是和谈破裂。1937年8月24日，浙南国共双方终于在温州达成合作抗日的协议。在这之前，红军挺进师还在具体政策和斗争策略上作了一系列调整，以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为了扩大团结对象，缩小打击目标，红军挺进师改变了过去打土豪的办法，把“没收委员会”改为“征收委员会”；把没收地主豪绅的财产改为“征收抗日捐”；对国民党的乡镇长、保长由严厉惩治改为尽可能予以争取；对付国民党军队的政策由“欢迎白军士兵杀死长官，拖枪当红军”改为“欢迎白军官兵枪口对外，同红军一起共同抗日”；把“穷人不打穷人”的口号改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总之，这些具体政策的调整，扩大了红军挺进师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力，也为浙南国共两党成功举行谈判创造了条件。

（六）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

红军挺进师以泰顺为中心区域开展游击战争的三年间，非但没被打垮，反而愈发壮大，建立了浙南游击根据地，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实属罕见。这与红军挺进师深入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深入群众，融入



红军山洞医院

群众。挺进师以泰顺为立足点创建革命根据地，是极其不容易的，军民在语言交流上就遇到极大困难。泰顺境内有3大语系8种方言，初到时，红军挺进师向当地群众借东西、问事儿等都要靠做手势才能沟通，对群众进行宣传工作或者相关调查时，则需要有人来翻译。包括刘英在内的红军挺进师领导人，为此积极带头学习泰顺方言，并要求全军指战员学习当地方言。这样一来，挺进师很快就跟群众打成一片，很好地践行了群众路线。二是军民情深，鱼水交融。泰顺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支持红军挺进师开展革命活动，为革命事业作出重要贡献。如泰顺县南院棠坪村刘素贞母子四人，先后参加革命，全力支持红军，

最后在1936年先后壮烈牺牲。留下“一门四英烈”的故事。又如1937年2月，峰文战斗过后，红军有30多名重伤员难以随军转战，急需安置救治，刘英决定在峰文乡双溪口村一带安置医治伤病员。双溪口村党支部书记黄明星毅然接受了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他带领周边各村的党支部，将伤病员秘密安置在几个人迹罕至的山洞内，悉心照料。当地党员与革命群众在救护红军伤病员的过程中，有的被搜山的敌人枪杀，有的被捕，即使在敌人严刑拷打的情况下仍守口如瓶。在众多的党员干部和革命群众的共同努力下，经过8个月治疗，30多位重伤员除1名牺牲、2名被捕、1名叛变外，其他人都重返战斗岗位。

红军挺进师以泰顺为中心区域 开辟浙南游击根据地的历史功绩 和重大影响

红军挺进师以泰顺为中心区域开辟浙南游击根据地，是中国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的一件大事，也是浙江省现代历史上的重大军事斗争事件，它极大地丰富和充实了浙江省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内涵，促进浙江革命形势的蓬勃发展，在党的革命斗争史中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重燃了浙南的革命烽火。1935年秋，红军挺进师转战浙南，以泰顺为中心区域，开辟浙南游击根据地。这时期，革命形势普遍处于低潮。就全国而言，1935年秋，全国红军主力部队处在长征路上的最后阶段，到1936年10月才全部到达陕北会师。20世纪30年代上半期的浙南地区，经历了“红十三军”起义的惨败，经历了浙南特委从再次成立到再次失败以及中共浙南委员会从成立到失败等重大挫折。当时的泰顺县，正处在从“青帮会”农民暴动失败到闽东红军开辟泰顺新区的过渡时期。在这关键时刻，红军挺进师进入泰顺，重燃了浙南革命烽火，从而使浙南

成为“中国革命在南方的一个战略支点”。在红军挺进师的领导下，于1936年3月在泰顺成立了中共浙南特委。它成为浙南革命运动的领导核心和中坚力量。此后14年间，浙南人民和浙南地下党组织在浙南特委的正确领导下，取得反“围剿”斗争胜利，迫使浙南国民党当局同意合作抗日；取得“隐蔽精干”斗争和解放战争的重大胜利，最终实现浙南人民的大翻身。

（二）策应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1935年2月，红军挺进师刚组建时，党中央给挺进师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配合中央红军主力部队行动，调动和牵制住大批敌人，彻底粉碎敌人对中央红军的‘清剿’”。红军挺进师进入泰顺以后，开展了多次战斗，很大程度上牵制住了国民党驻浙南和闽东的部队，尤其还表现在对抗刘建绪部队的“围剿”上。1936年12月，闽浙赣皖四省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刘建绪按照蒋介石“北和南剿”的方针，调集43个团10余万兵力，对上述地区的红军发动第二次“清剿”。刘建绪的部队采用拉网式推进战术，企图逐渐将红军挺进师逼向东南一隅，而后在飞云江以南、沙埕港以北的沿海地区聚而歼之。按照上述军事

部署，敌人还派遣2个保安团前往泰顺、寿宁，封锁浙闽边界，妄图一举歼灭红军挺进师。挺进师采取“隐蔽骨干，保存力量与机动灵活，积极作战相结合”的方针，采取与敌人相向对进、易地而战的打法，采取“敌人梳过来，我们钻过去，你要我的山头，我要你的后方”的办法，以少量兵力抗击了国民党军大部队的进攻，较长时间地牵制住敌人，这为红军主力取得长征的伟大胜利和立足陕北，起到策应作用。

（三）为抗日输送了优秀子弟兵。根据浙江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协议，分散在浙南、浙西南的红军挺进师部队于1937年10月陆续到平阳北港山门集中，其中就包括了在泰顺隐蔽的60多名地方干部与伤愈归队的红军战士，也包括了从泰顺新征的一批优秀子弟兵（仅泰顺月湖柘下村就有10多人前往报名参军）。这支部队随即在平阳凤卧镇凤林村宣布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粟裕任队长，刘英任政委，下属三个支队和一个教导队。经过短期培训，粟裕率领由红军挺进师改编过来的部队400

余人，于1938年3月18日从平阳山门出发，奔赴皖南抗日前线。

（四）为浙南革命保留精干力量。1938年3月，在粟裕率领浙南红军开赴抗日前线之时，留下三个短枪班（浙南2个班，浙西南1个班）和部分干部，继续在浙江坚持斗争。这些“留守”的力量，以浙南根据地作为战略支点，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指引下，全力推进浙江全省的抗日救亡运动，使浙江成为华东各省区的模范。留下的这一批党组织和武装斗争的领导骨干，也为1938年8月建立统一的中共浙江省委奠定了基础。1942年5月，刘英同志牺牲后，中共浙南特委书记龙跃继续领导浙南基本地区工作，团结英雄的浙南人民将红军挺进师在浙南点燃的革命烈火继续燃烧下去。1949年5月，在浙南特委的正确领导下，浙南游击纵队解放了泰顺、永嘉、玉环、文成、瑞安、乐清、平阳、景宁、青田、温岭、黄岩等11县。

〔作者单位：中共泰顺县委党史研究室（县地方志办公室）〕

浅论梅山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地位

◇ 中共瑞安市委党史研究室

瑞安梅山游击区曾是浙南地区一个很重要的革命根据地，曾经在浙江革命尤其浙南革命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对浙南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

梅山地区位于瑞安的西部山区，东与温州相连，以五云山为屏障；南接平阳，与泰顺、闽浙边相通；西北与李山、东背（1950年后划归文成玉壶，文成大部原系瑞安大岙区）毗连；东北与湖岭坳后及瓯海（后从永嘉析置）相连；北接青田，与青（田）景（宁）丽（水）连成一片。梅山分布有叶寮、下歇平（1950年划归文成）、长湾、水碓坑、毛田等十几个自然村，与毗邻的大垟坑（牛栏坑系其自然村）、李山等合在一起，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被统称梅山地区（即梅山游击区）。这里山高林密，海拔从400米到800米不等，最高峰海拔在900米以上，而且地处偏僻山区，距离中心城镇较远，敌人的

统治力量相对薄弱，又是浙南与浙西南、浙东南的往来走廊，战略迂回空间大，攻守兼备，是建立根据地的理想场所。因而在土地革命时期就引起党组织的关注，1929年前后就有雷高升、陈卓如、郑贤塘、胡义乾等到东岩青坑、朱坑、驮庵等地开展革命活动，建立党组织和农民赤卫队，开展打土豪运动，还有人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一团。1932年，随着红十三军的失败，浙南的革命活动转入低潮，梅山的革命活动也由公开转入隐蔽。直到粟裕、刘英率领的红军挺进师进入浙南，才重新点燃了瑞安梅山的革命火种。

由于群众基础坚实可靠，1944年后浙南特委长期驻扎在瑞安梅山等地，梅山一带先后属于瑞平区（平阳县委领导），中共浙南特委直属区（又称梅山区）。从1941年到温州解放，梅山区一直是浙南党组织和人民武装可靠的根据地和大后方，是浙南

特委解放浙南全境（包括浙南、浙西南地区及台属部分地区、闽北部分地区）的指挥中心之一。

梅山是粟裕率领红军挺进师 亲自开辟的秘密革命根据地

1935年秋冬，粟裕部队进驻梅山，决定在此建立秘密游击区。1935年10月底，红军挺进师在粟裕带领下，在玉壶歼灭浙保第十大队一个分队。11月上旬，粟裕、刘英攻下珊溪镇，决定以珊溪为枢纽，立足瑞安、平阳、泰顺之间，制定向东南和东北发展的策略，然后经李山、梅山、营前、高楼、平阳坑进入平阳滕家堡。程美兴同志回忆：“1935年9月，红军挺进师到达闽浙边，到了浙南地区的泰顺、瑞安。在瑞安县境内活动最早的是珊溪、高楼、梅山、营前等地，紧接着在平阳北港和现在的苍南县的一些地方。”1936年2月，粟裕率部队进驻梅山，安排王忠烈等40多人留在梅山、大垵坑一带开展游击活动，宣传发动群众，组织农民武装，建立革命根据地。

1937年2月5日，泰顺峰文战役的第三天，红军挺进师歼敌数百人之后，兵分两路撤出战斗。刘英向东，

转移到瑞平边区活动，粟裕率主力经泰东南、瑞安，在梅山休整三四天，经青田到浙西南。

3月3日，粟裕率部经五云山、梅山，向



粟裕

青田方向挺进，部队在梅山叶寮遭国民党军队偷袭，粟裕派挺进师干部舒雨旺带一个支队留在梅山老游击区活动，自己则率主力部队突围后向浙西南挺进。在梅山，舒雨旺等人先找到在叶寮战斗中失散的郭金旺等40多名战士，后又找到王忠烈逃跑时留下的40多名战士。后郭金旺投敌，舒雨旺率领红军战士100多人以梅山为基本落脚点，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持游击活动8个月，同国民党军进行顽强的斗争，最终保存了革命力量，发展了党组织，巩固了梅山游击区。10月舒部收到刘英的信，才到山门集中随粟裕北上抗日，刘英得知舒雨旺不仅保存了部队，而且还有发展之后，对他大加表扬。舒雨旺回忆：“梅山是个游击区，以往掉了队的或被打散的同志都到梅山集中……经过粟裕的开导，我认识到任务的重要性，当晚就带了

一个班返回梅山。”“我们一百多人，就在以梅山为中心的方圆五十多里的山区，开展了历时八个月的游击战争。”

粟裕同志则回忆：“1936年底，挺进师再次由几百人发展到1500多人，地方游击队和群众武装达数千人……我们有了像浙南这样比较巩固的大块根据地，还有了如宣遂、汤边区及青瑞边的梅山、李山至飞云江边的五云山等小块的游击根据地和大量分散的游击基点。”

由于梅山那时是秘密游击区，加上通讯不便，刘英和程美兴当时还不清楚这件事。据程美兴回忆：“……刘英同志在沙门山一带活动期间，我带一个组去五云山、梅山一带活动，才晓得粟裕同志率领部队经过瑞安时，在梅山留下许信焜、刘达云（后叛变）一个支队，粟裕同志继续率部前进……”

从1929年起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止，梅山地区被国民党“围剿”11次，受害群众达14个村，房屋被烧24户，共55间，被敌政府判死刑1人（胡义乾），直接被敌杀害5人，被敌打伤或受酷刑死亡5人，被判徒刑15人，被捕人员78人。即便如此，梅山人民依旧没有被吓倒，他们参加红军，继

续开展革命活动。至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梅山及其周围村庄参加红军64人，建有农民赤卫队、武装队2支，共62人。在血雨腥风之中，梅山革命根据地不但没有动摇，反而更加巩固，革命红旗始终不倒。

梅山是刘英同志非常重视的一个革命根据地

1937年，闽浙边临时省委派程美兴、张金发等在瑞安五云山、沙门山、梅山一带开展革命活动。6月，省委书记刘英在沙门山、五云山、梅山、纸山一带发展党员20多名。1941年7月8日，刘英针对当时抗战形势，结合浙江实际以及侵华日军在温州的动向作出正确估计，并专门写一封指示信给瑞安县委书记程美兴，信中强调“瑞安工作是东南工作的屏障，是此间与各地联系的枢纽，因此瑞安工作的好坏，对浙江党整个工作的进行实有重要的意义”，并强调要“打通与梅山的联系”。程美兴收到刘英指示信之后，马上着手进行部署，巩固东一、东二区，稳定城区，发展南区和北区，开辟五云区和瑞安西北区，并努力使五云、西北区与梅山区联成一片。



梅山会议旧址

梅山是“梅山会议”等浙南特委重要会议召开的地方

1942年2月下旬，在浙江省委机关遭破坏，中共中央华中局特派员、浙江省委书记刘英被捕，浙江各地区党组织遭到破坏、党组织干部与革命群众纷纷被捕杀害，浙江革命处于“风雨如磐，人心浮动”的危急时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浙南特委书记龙跃在梅山长湾召开浙南特委紧急会议，并作出继续隐蔽精干方针，坚持农村革命根据地等重大决策，史称“梅山会议”或“梅山紧急会议”。会议的决定完全符合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胜利”

的正确理论，从根本上解决了浙南党组织的去向、道路问题，在浙南革命最危险的时刻，挽救了浙南党和浙南的革命。这是一次决定浙南党组织命运，坚持“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的重要会议，从此开启了浙南革命走向胜利的新篇章。随后，各县（区）党委积极贯彻梅山会议精神，坚持隐蔽精干方针，恢复老区和党组织，有效保存了革命力量。从瑞安梅山会议开始，浙南特委坚持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向不动摇，终于渡过难关，打开局面，最后配合大军渡江的大好形势，取得了解放温州城和浙南全境（包括处属青景丽地区、台州部分地区和闽浙边部分地区）的重大胜利。这一切是“梅山会议”所作

正确决定的必然发展结果。

1947年10月3日至29日，龙跃在特委直属区（梅山区）长湾主持召开浙南特委第八次扩大会议。会议总结一年来的工作和武装斗争经验，布置了今后工作任务，作出了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浙南游击纵队、派出较强部队到外线作战、调整部分县区委等重要决定，大大加快了根据地和军队建设步伐。

1948年4月7日至5月25日，中共浙南特委在特委直属区（梅山区）牛栏坑召开第九次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军队建设的决定》《军队政治工作制度》等文件，决定建立各支队、县队、区队和警卫大队党支部，为巩固党对军队的领导和军队规范化建设奠定基础。会议还就扩大人民解放战争、开展“六抗反霸”斗争、建立农青妇组织和乡村政府等重大事项作出了部署。这次会议对加强党的工作，加强军队建设，广泛开展群众运动，建立民主政权，培养训练干部，扩大巩固游击根据地，推动浙南游击战争的蓬勃发展都起了重大的作用。会后，浙南游击队开始广泛出击敌据点，进攻瓯江南北的大小城镇，拔除了一批中小据点，打垮和消灭了大部分的敌军。牛栏坑会议标志着我军已

由劣势转变成优势，完全掌握了浙南游击战争的主动权，战斗的方式也由夺取敌方小据点发展到进攻敌人据守的城镇，打垮和消灭整连整营的国民党军。

梅山是浙南特委、平阳县委、 特委直属区（梅山区）的常驻地 永瑞县委的曾驻地

1936年前后，永瑞县委机关驻地设在瑞安梅山。据龙跃《坚持浙南十四年》第53页载：“因此，浙南游击根据地又扩大了……并与飞云江以北由挺进师建立了秘密工作的五云山和梅山山区联系起来了（当时的永瑞县委设在梅山）。 ”

瑞平区的建立表明梅山根据地已非常稳固。1940年5月，中共平阳县委派干部到梅山一带建立交通联络站，恢复和发展了一批村党组织。1940年秋至1942年国民党顽固派一再掀起反共高潮，平阳因为红军挺进师由此誓师出征、召开“中共浙江一大”而成为他们的“清剿”重点，党组织几乎被破坏殆尽，党的干部与革命群众大量被捕杀，从而陷入白色恐怖之中，平阳县无法立足，被迫转移到梅山革命根据地。浙南特委决定将梅山、

牛栏坑一带划归平阳县委领导。在1942年梅山紧急会议之后，浙南特委机关从梅山转移到青景丽地区活动。1942年秋，浙南特委常委、平阳县委书记郑海啸在牛栏坑宣布建立瑞平区委（郑志察为区委书记），归平阳县委领导，区委驻梅山、牛栏坑。此后，进一步开辟新区、发展党组织、扩大活动地盘，平阳县原有的革命老区部分得到恢复，与瑞平区建立了紧密联系。至1944年春，以梅山为中心的瑞平区已成为相当稳固的根据地，为特委机关迁回瑞安革命根据地准备了良好的基地。

1944年春，浙南特委机关从青（田）景（宁）丽（水）迁回梅山等瑞安革命根据地，梅山成了浙南特委主要的常驻地之一。瑞平区既是浙南特委的常驻地，也是平阳县委机关常驻地，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革命活动越来越频繁。为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1947年浙南特委决定撤销瑞平区委，建立特委直属区（又称梅山区）委，归特委直接领导，直属区委驻地设梅山。在梅山建立浙南特委直属区，意味着梅山不仅是非常稳固的革命根据地，而且已成为浙南特委指挥浙南革命的中心之一。

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后，温州地区学生爱国运动频频发生，一大批进步学生和爱国知识青年纷纷涌向牛栏坑等游击根据地，投奔革命。为此，浙南特委于1947年至1949年期间，先后在牛栏坑、梅山、小方山、南坑炉等地举办了6期青训班，为即将到来的革命胜利和建设事业培养后备干部队伍。

综上所述，瑞安梅山区是粟裕同志在早期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活动的基础上，率领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创建的一块秘密革命根据地，是刘英、龙跃、程美兴、郑海啸等同志非常重视和着力培育的浙南革命根据地之一，是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曾驻地，中共浙南特委、平阳县委常驻地，是梅山会议、浙南特委第八次扩大会议与第九、第十次扩大会议的会址，事实上从1942年初就继平阳北港成为了浙南革命的中心，1944年后是浙南特委的主要驻地，是浙南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即总部所在，无疑是瑞安最重要的革命根据地，是南方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浙南革命历史发展的长河之中发挥了重大的历史作用，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

（执笔：苏尔胜 王学柒）

【史志书讯】

《浙南百名英烈传》《温州百年百事》 《温州百年大事记》公开出版发行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总结党在温州的百年奋斗成就和历史经验，中共温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写出版《浙南百名英烈传》《温州百年百事》《温州百年大事记》三部著作。这三部著作系《百年党史在浙江》系列成果，也是温州市庆祝建党百年的系列作品。

《浙南百名英烈传》由中共浙江省委原副书记陈法文作序，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共计45万字，主要收录解放前牺牲的浙南著名革命烈士传略，包括温州籍在本地或外地牺牲的烈士、外地籍在温州牺牲的烈士、主要战斗经历在温州的著名烈士以及民政部和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布的温州籍抗日英烈等，采用纪传体形式，力求完整准确地反映革命先烈光辉的一生。

《温州百年百事》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按照以时有序、厚今明古的要求，选取100年间发生在瓯越大地



上的100件具有影响力、感染力、凝聚力的历史事件，力图较完整地反映温州百年间的变化与成就，使全市党员干部学习了解党领导温州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光辉历程，追忆峥嵘岁月、触摸历史余温的同时，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全书计40.6万字，以事件为载体，客观叙述，见事见人，注重图文并茂，兼顾知识性、可读性。

《温州百年大事记》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全书计44.2万字，采取编年体方式，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

（下转第90页）

周去非《岭外代答》的地方志属性

◇ 张声和

周去非所著的《岭外代答》历千年之后，一直留传于今，是当今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珍贵史料。《岭外代答》是他在广西钦州任“教授”期间，通过船舶上的商贾或译者之口收录边疆资料，于孝宗淳熙五年（1178）写成。不仅是亲历、亲见、亲闻的三亲史料，且写法上大有地方志的属性。也有专家索性将《岭外代答》归属于地方志书目。

周去非（1135—1189）字直夫，永嘉学派创始之一周行己的族孙。周去非于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中进士，任温州“教授”之后，前往南海之滨的广西钦州担任“教授”。“教授”是宋代地方官学中的职务，除传道授业外，还参与地方文化活动，甚至直接管理地方政务，是当地社会中具有重要地位的人物。周去非历任桂林尉、州学教授等，后官至绍兴府通判，虽然一辈子没任过大的职务，但他的《岭外代答》却进入史册。

精确的地理文献典籍

周去非《岭外代答》所记述事物均位于广西、广东境内，与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明代徐霞客《粤西游记》、张鸣凤《桂胜》《桂故》，清代赵翼《粤滇杂记》、李调元《粤风》、吴震方《岭南杂记》等同属地方文献典籍，是地方史的综合研究文献，且相比之下，周去非《岭外代答》的地方志属性更加明显。

此著十卷，共录存二百九十四条。周去非在《自序》中称，此书承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之基础，加以岭南见闻而成。其设置的《风土门》《蛮俗门》《志异门》《地理门》《外国门》《法制门》《财计门》《器用门》《服用门》《食用门》《乐器门》《古迹门》等，与古代地方志相通相似，分门别类地描述本土风俗民情、民族习性、文物古迹、人

文地理、物用特产等，综合性地反映出粤西和广西地区历史文化的整体状况。后来学者基于周去非的著作进行学科综合研究，形成了桂学跨学科研究的重要门类。

我国宋代地方志传世30多种，保存数量少得可怜，仅占现存方志（八千五百多种）的极小部分，但其地位是很重要的。宋代方志是从地记、图经发展成熟的，也就是说，在我国方志史上，到宋代才形成真正的地方志。因此，周去非的《岭外代答》有相当部分的内容属于地记类，其内容多有地方志属性，故显得珍贵。此书一大贡献是，于地理考据详实，罗列真实，记述得当，又有古代的词义释注。如记《五岭》，说出了“五岭”并不是山名：自秦世有五岭之说，皆指山名之。考之，乃入岭之途五耳，非必山也。自福建之汀，入广东之循、梅，一也；自江西之南安，踰大庾入南雄，二也；自湖南之郴入连，三也；自道入广西之贺，四也；自全入静江，五也。乃若漳、潮一路，非古入岭之驿，不当备五岭之数。桂林城北二里，有一坵，高数尺，植碑其上曰“桂岭”。及访其实，乃贺州实有桂岭县，正为入岭之驿。全、桂之间，皆是平陆，初无所

谓岭者，正秦汉用师南越所由之道。桂岭当在临贺，而全、桂之间，实五岭之一途也。

如记《天分遥》，解释一折为“遥”，以此来说明“遥”之来历，今人一读，方知“遥远”另有释义。对“遥”如此之解，这在《新华字典》里没有，因为这是“南人”之说：钦江南入海，凡七十二折。南人谓水一折为遥，故有七十二遥之名。七十二遥中，有水分二川。其一，西南入交址海。其一，东南入琼廉海。名曰天分遥。人云，五州昔与交址定界于此，言若天分然也。今交址于天分遥已自占，又于境界数百里吴婆灶之东以立界标，而采捕其下，钦人舟楫少至焉。

在《岭外代答》中又记钦州也有一个“天涯海角”，则是天涯亭与海角亭组合：钦州有天涯亭，廉州有海角亭，二郡盖南辕穷途也。钦远于廉，则天崖之名，甚于海角之可悲矣。斯亭并城之东，地势颇高。下临大江，可以观览。昔余襄公守钦，为直钩轩于亭之东偏，即江滨之三石，命曰钓石、醉石、卧石。富为吟咏，载在篇什。

周去非是温州人，江浙一带的潮水与广西有不同之处。在温州民间

有“初一十五两头潮”之说，每天都有两次潮涨。在《岭外代答》记有“潮”之一目，指出那边的海水每天只有一次潮：江浙之潮，自有定候，钦廉则朔望大潮，谓之先水，日止一潮。二弦小潮，谓之子水，顷刻竟落，未尝再长。琼海之潮，半月东流，半月西流。潮之大小，随长短星，初不系月之盛衰，岂不异哉！

《岭外代答·外国门》有条目“大秦国”。大秦国，东汉以后屡见于史籍，或指罗马帝国，或指东罗马，或指小亚细亚、叙利亚等地，随时代而异，殊不一定。另有注：《代答》所言大秦国，就地望言，惟突厥人所建之加兹尼利亚教王朝，足以当之。此王朝存在于962至1186年，强盛时期于998至1030年，版图西起伊拉克，经里海，东至恒河流域。这类关于古国名的记述，为现代学者提供了一手资料。周去非这段文字记得朴实，没有太多的文字装饰，如同现代人的地理采访日记，通俗亦可信：大秦国者，西天诸国之都会，大食蕃商所萃之地指徒事官也。其王号麻囉弗。以帛织出金字缠头，所坐之物，则织以丝毯。有城郭居民。王所居舍，以石灰代瓦，多设帘帟，四围开七门，置守者各三十人。有他国进

贡者，拜于阶之下，祝寿而退。屋下开地道至礼拜堂一里许。王少出，惟诵经礼佛，遇七日即由地道往礼拜堂拜佛，从者五十人。国人罕识王面，若出游骑马，打三檐青致，马头项皆饰以金玉珠宝。邈年，大食国王号素丹遣人进贡。如国内有警，即令大食措置兵甲，前来抚定。所食之物，多饭饼肉，不饮酒，用金银器，以匙挑之。食已，即以金盘贮水濯手。土产琉璃、珊瑚、生金、花锦、绁布、红马脑、真珠。天竺国其属也。国有圣水，能止涛，若海扬波，以琉璃瓶盛水洒之，即止。

政事与风情并举

周去非在《岭外代答》（卷五）之“财计门”“广右漕计”中记录当时税政，可考岭外的时政税政，并有夸赞张栻以民为本的思想：厥后张南轩为帅，乃请于朝，以三分盐息予诸州，而免诸州民户苗米每一石取二斗之耗。后以诸郡实卖数奏请，其额稍减。

周去非写书准备充分，采访记录详尽，尤其是对周边的小国记述很多，可以看出当时边境外贸的盛况。如记录“波斯国”，虽然名称一致，

但是宋时波斯不是现在的波斯。美国学者劳费尔《中国伊朗编》谓中国古籍中所言之波斯，有伊朗波斯，又有马来西亚波斯，二者截然有别。法国学者费琅在《南海中之波斯》《西域南海或民史地考证译丛》中，称南海中之波斯有二，一在缅甸，一在苏门答腊东北岸：西南海上波斯国，其人肌理甚黑，鬓发皆拳，两手铃以金串，缠身以青花布。无城郭。其王早朝，以虎皮蒙机，叠足坐，群下礼拜。出则乘软兜或骑象，从者百余人，执剑呵护。食饼肉饭，盛以瓷器，掬而啖之。

关于瑶族之得名，说法甚多。现在广西地方志引用多从《岭外代答》之说。

《山海经·大荒东经》所言“瑶民”之后，或谓即《说文》僇字条所谓“南方有焦人”之“僇”，或谓即《广韵》瑶字条，所谓“獠瑶，狗种也”之“瑶”。较为通行者则为《隋书·地理志》《梁书·张传》等书所言之“徭”。“自云其先祖有功，常免役，故以为名。”也有“莫徭”说法，当地土著人僻处山林，随时迁徙，徭役所不能及，亦势必免役，故“莫徭”之说，较近事实。惟瑶人在宋代，有的供赋役，有的不供。《宋

史·蛮夷二》：“山徭、峒丁之常租，仍虚挂版籍。”所言即属前者。范志（《通考》三二八引）：“名为徭，而实不供征役”则属后者。《代答》所言，与《隋志》范《志》等说法相反，别有见解。这就是周去非的《岭外代答》的价值所在：徭人者，言其执徭役于中国也。静江府五县与徭人接境，日兴安、灵川、临桂、义宁、古县。徭人聚落不一，最强者曰罗曼徭人、麻园徭人。其余曰黄沙，曰甲石，曰岭屯，曰褒江，曰赠脚，曰黄村，曰赤水，曰蓝思，曰巾江，曰疎江，曰定花，曰冷石坑，曰白面，曰黄意，曰大利，曰小平，曰滩头，曰丹江，曰糜江，曰闪江，曰把界。山谷弥远，徭人弥多，尽隶于义宁县桑江寨。徭人椎髻临额，跣足带械，或袒裸，或鹑结，或斑布袍袴，或白布巾。其首则青巾紫袍。妇人上衣下裙，斑斓勃窣，惟其上衣斑文极细，俗所尚也。地皆高山，而所产乃輜重，欲运致之，不可肩荷，则为大囊贮物，以皮为大带挽之于额，而负之于背，虽大木石亦负于背。徭人耕山为生，以粟、豆、芋魁充粮。其稻田无几，年丰则安居巢穴，一或饥馑，则四出扰攘。土产杉板、滑石、蜜蜡、零陵香、燕脂木。静江五县沿

边，唯兴安、义宁县官，任满有边赏。

关于政事方面，周去非还记录《土丁保丁》之事。土丁沿边民兵，保丁为保甲法（始于熙宁三年）后遍于各地之民兵。沿边之地，挑选土丁后，其余再挑选保丁。广西沿边之土丁、保丁。《宋史·兵六》：“二广保丁，每户一名土，父子兄弟皆在其数。”可见苛政之一斑。这种边境上土丁保丁制度，有召之即来，来之能战，全民皆兵的好处。“素教其民，一旦头有警，则百万之师，可以遽集”的古代兵制，这让周去非记了下来，是研究边疆兵制的珍贵史料：自德智高平，朝廷联一路之民以为兵，户满五丁者，以一为土丁；二丁者以一为保丁。熙宁六年，诏依河北义勇例，修立条制如禁军，置都虞候以下六阶以隶之。因其民之资序，而为之阶级，专属经略司调发。其保丁则隶于州县，而以保正统之。八年，广西诸司乞以土丁教阅，今保丁亦教也。每岁农隙，会土、保丁，越州若县，教以坐作进退号令旗鼓之法，一季而罢。立法之意，盖以广民彫弱，人无固志，若素教其民，一旦头有警，则百万之师，可以遽集。今乃州县私役于教阅之余，寔失初意，然有不

可不役者。广西城壁，皆以土为周，覆以屋。一岁不葺，多致腐压。为郡将者，先尽加教阅之道，以体立法之意，乃约城屋当用之工，分部竭作，不容私役。旬月集事，即日散之，民亦乐从，而不以越为劳矣。

民俗、物产、工艺记周详

民俗，是地方志中最主要的内容之一，古志中亦称“风俗门”“风俗篇”“风土记”等，是记述地方风俗的篇目，与地方志体例同。在我国典籍中，最早见于汉代《郡门志书》。而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则开我国风俗专志的先例。至隋唐，方志已经形成一定的规矩，在综合志书中，须有风俗记述，此为后来地方志所沿袭。方志学家章学诚在《校讎通义》讲：“理大物博，不可殫也，圣人为之立官分守，而文字亦从而纪焉。”

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可以说是我国成书较早、又较为详尽的民俗志，具有地方志属性。其篇幅之大，叙述之详，域事明确，史料丰富，又是我国一部保存完整的风土专志。

周去非对于民俗记得很详细。如《斗鸡》记载了番禺人好斗鸡的习

俗：

番禺人酷好斗鸡。鸡之产番禺者，特善斗。其人饲养亦甚有法，斗打之际，各有术数。注以黄金，观如堵墙也。凡鸡，毛欲疏而短，欲竖而小，足欲直而大，身欲疏而长，目欲深而皮厚。徐步眈视，毅不妄动，望之如木鸡。如此者，每斗必胜。

人之养鸡也，结草为墩，使立其上，则足常定不倾。置米高于其头，使啄之，则头常竖而嘴利。割截冠，使敌鸡无所施其嘴。剪尾羽，使临斗易以盘旋。常以翎毛搅入鸡喉，以去其涎。调饲一一有法。

至其斗也，必令死斗。胜负一分，死生即异。盖斗负则丧气，终身不复能斗，即为鼎食矣。然常胜之鸡，亦必早衰，以其每斗屡濒死也。

斗鸡之法，约为三间：始斗少顷，此鸡失利，其主抱鸡少休，去饮水，以养其气，是为一间；再斗而彼鸡失利，彼主亦抱鸡少休如前，养气而复斗，又为一间；最后一间，两主皆不得与，二鸡之胜负生死决矣。鸡始斗奋击用距，少倦则盘旋相啄，啄得所嘴牢，不舍副之以距。能多如是者必胜，其主喜见于色。

小人好胜，为此歹毒，使微物不得生，自三代已然。

此书重点记述的是广西事带的风情习俗，但还记有南海诸国与麻霞国（今麦加）、白达国（今伊拉克）、勿斯离国（今埃及）、木兰皮国（马格里布，即今北非一带）等国家和地区的风情。其中“麻霞国”条记：

“此是佛麻霞勿出世之处。有佛所居方丈。以五色玉结甃成墙屋。每岁遇佛忌辰，大食诸国王，皆遣人持宝贝金银施舍，以锦绮盖其方丈。每年诸国前来，就方丈礼拜。并他国官豪，不拘万里，皆至瞻礼。方丈后有佛墓，日夜常见霞光。人近不得，往往皆合眼走过。”记得真切，实为中国人对千年前麦加城及伊斯兰教朝觐盛况所亲见的文字记录。

又，对木兰皮国的记载：“当地的植物长得很怪异，此地植物的体积于中国相比要大很多，米麦谷粒长2寸，瓜周6尺，羊种体型很大，高数尺，羊尾如扇，米麦藏地窖，几十年不腐，石榴重五斤，桃重2斤，莴苣菜长4尺，重达十余斤。”这些条目，在今天读来，趣味十足，并有科教价值。

《岭外代答》中对有特色的，你有我无的事物记得较多，如“綵”，其实就是丝绒织成的锦，后来人称这为土锦。周去非记曰：邕州左、石右

峒蛮，有织白綾，广幅大缕，似中都（指京城）之线罗，而佳丽厚重，诚南方之上服也。

我国幅员辽阔，由于广西当时的闭塞，用布与当时的杭温一带也有差异。古代将葛、麻等质料织成较为粗劣的纺织物称之为布，而上等的则为锦。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清楚记述了广西地区织布的工艺：广西触处富有苎麻，触处善织布，柳布、象布。商人贸迁而闻于四方者也。静江府古县民间织布，系轴于腰而织之，其欲他干，则轴而行。意其必疎数不均，且甚慢矣。及买以日用，乃复甚佳，视他布最耐久，但其幅狭耳。原其所以然，盖以稻穰心烧灰煮布，而以滑石粉膏之，行梭滑而布以紧也。

《岭外代答》中记录了瑶斑布，便类似于现在留存的古法蓝夹纈。蓝，指蓝靛。提取蓝靛之植物，明宋应星《天工开物》三蓝淀条谓有茶蓝、蓼蓝、马蓝、吴蓝、莫蓝五种。皆由叶制取。此染斑之法，即蜡染，亦称蜡纈。在中原唐代已臻极盛。有色彩鲜艳之染制品，作宫廷服饰。宋代以后，此工艺在中原逐渐衰退失传，转向南方的民族地区。这门染布方式至今在温州的苍南、平阳等地的畲族地区还保存着，渐升级为非物质

遗产进行保护：瑶人以蓝染布为斑，其纹极细。其法以木板二片，镂成细花，用以夹布，而熔蜡灌于镂中，而后乃释板取布，投诸蓝中。布既受蓝，则煮布以去其蜡，故能受成极细斑花，炳然可观。故夫染斑之法，莫瑶人若也。

安南绢，是周去非笔下的丝织品。此条目与范成大的《诸蕃志》海南条相同，所记的是黎人居住地区的丝绢：安南使者至钦，太守用妓乐宴之，亦有赠于诸妓，人以绢一匹。绢粗如细网，而蒙之以绵。交人所自着衣裳，皆密绢也。不知安南如网之绢，何所用也。余闻蛮人得中国红絁子，皆拆取色丝而自以织衫，此绢正宜拆取其丝耳。

吉贝，是指木棉花，有草、木本二种。《新唐书 南蛮传》中多处提到吉贝。其中《婆利传》云：吉贝，草也缉其花为布。代答本条是指草本，即今天的棉花：吉具木如低小桑，枝萼类芙蓉，花之心集皆细茸，絮长半寸许，宛如柳绵，有黑子十。南人取其茸絮，以铁筋碾去其子，即以手握茸就纺，不烦缉绩。以之为布，最为坚善。唐史以为古贝，又以爲草属。顾古、吉字为讹，草、木物异，不知别有草生之古贝，非木生之吉贝耶？

将微木似草，字画以疑传疑耶？雷、化、廉州及南海黎峒富有，以代丝紵。雷、化、廉州有织匹，幅长阔而洁白细密者，名曰慢吉贝；狭幅粗疎而色暗者，名曰粗吉贝。有绝细而轻软洁白，服之且耐久者。海南所织，则多品矣：幅极阔，不成端匹，联二幅可为卧单，间以五采，异纹炳然，联四幅可以为幕者，名曰黎饰；五色鲜明，可以盖文书几案者，名曰鞍搭；其长者，黎人用以褙腰。南韶所织尤精好。白色者，朝霞也；国王服白氍，王妻服朝霞；唐史所谓白氍吉具、朝霞吉贝是也。

周去非将棉花作如此细心记述，可见当时的杭温一带没有棉花种植，甚至没人见过，属于引进的物种。虽然所记的是现在很普通的棉花，但各地的使用方式不同，且棉花有品质等级的区分，故此书也是珍贵的关于棉花的考证史料。

特殊地域三亲史料

宋朝前后历320年，即使在失去了半壁江山的南宋，海外贸易也迅速兴起，海外商人和周边诸国来华贸易或朝贡的人数大为增加。周去非任职于与海外世界的“接缝处”，中外交往

之密切，给了他了解印度洋世界的现实机会。他责任使然，撰写了《岭外代答》，书中交融着华夏本土人民对伊斯兰世界及海外世界的认识。周去非的《岭外代答》是由边境百姓和海口市舶司官员根据耳闻累积的著作，属于三亲史料。

宋代于闽、广、浙等地均设市舶司，海外贸易日兴，但国人海外知识贫乏，强烈的使命感刺激着周去非去写普及海外知识的书。这也反映出宋代社会对于印度洋世界了解的需求，也反映出朝廷外交与贸易拓展的需要。当他从广西丁忧回来，好多同僚或亲戚朋友向他了解边疆情况，所以他在二度任职时就注重采访和记录，书以笔记“代答”。

周去非以“三亲”的笔调记下了四十多个国名，记述了二十余国的位置、国情与通达线路。他所记条目大多是始创之作，记的是无前人所记之事。在《岭外代答·诸蕃志》中，“所记国家五十有八，东自今日本、菲律宾；南止印度尼西亚各群岛；西达非洲，及意大利之西西里岛；北至中亚及小亚细亚，地域之广，为同时期中之同类著作所不逮”。所记方域范围较前典籍有所扩大，也表明国人对印度洋世界认识的推进。

航海外夷，是周去非记述对内和对外开拓贸易之事，宋代于浙江、广州、福建三路置提市舶司，“掌蕃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福建置于泉州，广南置于广州，“两浙市舶乃分建于五所”，长官称之为提举。《诸蕃志》的作者赵汝适，为提举职，从六品。可见当时朝廷重视贸易，其机构渐健全。《岭外代答》记曰：今天下沿海州郡，自东北面西南，外其行至欽止矣。州沿海州郡，类有市舶，国家绥安怀外夷，于泉、广二州置提举市舶司，故凡蕃商急难之欲赴愬者，必提举司也。岁十月，提举司大设蕃商而遣之。其来也，当夏至之后，提举司征其商而覆护焉。诸蕃之丰盛多宝货者，莫如大食国，其次阇婆国，其次三佛齐国，其次乃诸耳。三佛齐者，诸国海道往来之要冲也。三佛之来也，正北行，舟历上下竺，与交洋，乃至中国境。其欲至广者，入自屯门。欲至泉州者，入自甲子门。阇婆之来也，稍西北行，舟过十二子石而与三佛齐海道合于竺同屿之下。大食国之来也，以小舟运而南行，至故临国易大舟而东行，至三佛齐国乃复如三佛齐之入中国。其他占城、真腊之属，皆近在交趾洋之南，远不及三佛齐国、阇婆之半，而三佛

齐、阇婆又不及大食国之半也。诸蕃国之入中国，一岁可以往返，唯大食必二年而后可。大抵蕃舶风便而行，一日千里，一遇朔风，为损不测。幸舶于吾境，有保甲之法，苟泊外国，则人货俱没。若夫默伽国、勿斯里等国，其远也，不知其几万里矣。

周去非在上文中，对祖国边疆的开发、水路交通的辐射、诸国与我国沿海的航程大致距离，说得周详也准确。所说“夷”，随着边疆经济与人口变化，开拓度渐热，定义亦产生渐变。

《春秋》言：“内诸夏而外夷狄。”顾况在温州任职时，对“东瓠”亦以夷地称之：“何处乐神声，夷歌出烟岛。”周去非《岭外代答·地理门》载：“广西西南一方，皆迫化外。”他认为出南宋边境的都是化外之地。范成大也说过类似的话。从周去非和范成大等汉族知识精英的书可以看出，在南宋的广西已有越来越多夷汉杂居的现象，世居民族与汉族的往来交流渐深，若再将世居族群称为“蛮”便不妥了。这些族群作为南宋子民，渐纳入华夏民族之中，“蛮夷”的概念被逐渐改变。

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对华夏文明向南推移的历史具有考证意义。

这些南边的地区，直接连接着西方诸国，他在“西天诸国”的条目中记述了我国边陲地区与诸国的联系，这对于广西等边陲发展的研究、地名的演变来说，是珍贵的一手资料：西方诸国，大率冠以“西天”之名，凡数百国。最著名者王舍城、天竺国、中印度。盖佛氏所生，故其名重也。传闻其地之东，有黑水、淤河、大海，越之而东，则西域、吐蕃、大理、交趾之境也。其地之西，有东大食海、越之而西，则大食诸国也。其地之南，有洲名曰细兰国（指锡兰），其海亦曰细兰海。昔张骞使大夏，闻身毒国在大夏东南一千里。余闻自大理国至王舍城，亦不过四十程。案贾耽《皇华四达记》云：“自安南通天竺。”又达摩之来，浮海至番禺，此海道可通之明验也。

张栻幕僚和范成大诗友

由于周去非在岭外任职时间长，那里地理偏远，他与友人之间的交往文存较少保存，研究史料不多，但从《岭外代答》和他人的诗文中可寻找出一些行迹来。其中与张栻的相交尤为重要。

张栻（1133—1180），字敬夫，

又字乐斋，张浚之子，汉州绵竹人，迁于衡阳，世称南轩先生。他是南宋大学者、教育家，曾任吏部侍郎兼侍讲，官至右文殿修撰。与朱熹、吕祖谦齐名，时称“东南三贤”，乾道初，张栻为岳麓书院主教，讲公私义利之辩。与朱熹论学，引为同道，书信不绝。也与薛季宣、陈傅良、叶适和永嘉学派的学者交往密切。著有《论语解》《孟子说》《南轩集》。

张栻于淳熙二年（1175）二月知静江府（今广西桂林）兼经略安抚广南西路。因岳飞三子钦州知府岳霖聘，周去非第二次任钦州教习。淳熙四年（1177），张栻为钦州兴办儒学之事《钦州学记》有载：“安阳岳侯霖为钦州之明年，政通人和，乃经理其州学。……又明年，其学之教授周去非，秩满道桂，复以侯意来请。”

淳熙四年（1177），周去非钦州教授秩满归，在张栻那里做幕僚。“张南轩高弟”（《嘉靖温州府志》卷三），“学于南轩，常从之桂林”“周端朝其学本出于仲父去非，得南轩之传”（《宋元学案》卷七一）。可见，周去非与张栻、岳霖都有同事之谊，且与张栻还有师生之谊，虽然他们之间年纪只相差两岁。

淳熙五年（1178）五月，张栻离

任静江府知府和广南西路安抚使。十月初五，静江府通判周去非写成《岭外代答》。

周去非留下的诗可查到的只有一首《怀歔歔》。此诗作于何时，有何背景，已无可考。此诗只是山峦景观的普通描写，是山水诗：白云近空山，清风动修竹。竹间何所有，曲涧声谷谷。山迴何可穷，万里来悬瀑。昔有君子庐，清标谢王屋。北山兹正高，邦君见良烛。吾党讵敢忘，封植此佳木。

范成大有首诗《送周直夫教授归永嘉》，写于乾道九年（1173）春，时周去非自钦州教授告假回永嘉“丁忧”，范成大作诗相送。诗中的“知心海内向来少”，道出了他们的宦游交情：青灯相对许儒酸，老去羁游自鲜欢。昨夜榕溪三寸雨，今朝桂岭十分寒。知心海内向来少，解手天涯良独难。一笑不须论聚散，少焉吾亦跨归鞍。

回永嘉没多久，周去非二度到广西，“再仕峽南，备历崎岖”，到静江府所属古县任县尉（试尉桂林），历灵川知县和范成大的幕僚。范成大作有《陈仲思、陈席珍、李静翁、周

直夫、郑梦授追路过大通，相送至罗江分袂，留诗为别》，是送别五位宦友的，诗中将五人评点一遍，“周子隽拔俗”，说的就是周去非。诗中情感浓郁，惜别伤离：相送不忍别，更行一程路。情知不可留，犹胜轻别去。二陈拱连壁，仙李珣璣具，周子隽拔俗，郑子秀风度。嗟我与五君，曩如栖鸟聚。偶投一林宿，飘摇共风雨。明发各飞散，后会渺何处？栖鸟固无情，我辈岂漫与？班荆一炊顷，听此昆弟语。把酒不能觴，有泪若儿女。修程各著鞭，慷慨中夜舞。功名在公等，臞儒老农圃。

周去非在广西共历六年之久，从初仕为岭南，丁忧回温州后，又再仕岭南。在广西期间，两次任钦州教授。为了安下心来做实地调查，还自愿任官位较低的静江府属县尉。“试尉桂林，分教宁越”的经历，让他的收获是“随事笔记，得四百条”。楼钥说他是：“曾是半刺，仅得绯鱼”，舍弃身外声名，不刻意求仕途。所以，周去非的《岭外代答》有很强的地方志属性，是“资料具务，成竹在胸”，是用资料磨出来的风土志。

（作者系《温州市志》主编）

论地方志鉴文本信息化的“三部曲”

◇ 任瑾洛

地方志鉴文本信息化是一项跨越计算机学科和方志学科的研究课题。目前国内的相关研究中,针对地方志数字化、信息化的研究已有较多分析文章和成果,但多数是阐述信息化对地方志的重要性、作用及需要实现信息化的地方志资源种类,有的涉及到了信息化的实现方式,但不够系统,对于地方志资源的信息化表现方式也没有进行层次化的分析,从数字化和信息化概念辨析入手,清晰地解构地方志鉴文本信息化工作发展步骤的研究内容仍较为罕见。国内大部分的志鉴文本信息化基本停留在将文本内容转换存储至电磁介质的阶段,本文的研究内容将为志鉴文本信息化的下一步发展提供一定的方向性拓展。

全国志鉴文本信息化 数据库建设情况分析

根据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办公室

室的全国地方志统计数据,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全国地方志系统已建设有省级数据库24个,地市级数据库50个,县区级数据库26个。其中,地市级数据库山东(16个)、河南(10个)占比较高,县区级数据库山东(6个)、重庆(5个)、四川(4个)、河南(3个)占比较高。从数据中可以分析得到以下两条结论。一是省级地方志机构中已建设数据库的占比为75%(统计数据中包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不包含香港、澳门、台湾),总体来看,省级地方志工作机构中已建设数据库的比率较高。二是市、县两级地方志工作机构中已建设数据库的占比较低,而且主要集中在山东、河南等省份。部分县、县级市的地方志工作机构采取的是党史、档案、地方志三合一的架构,实际建设的是档案数据库,并不是地方志的数据库,因而县级的地方志工作机构已建设数据库的比率比统计情况还要低一些。

通过调查研究,市、县两级的地方志工作机构建设数据库比例较低的原因主要是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地方志鉴文本信息化建设本身就是一个集约过程,省级机构已经完成了大量的地方志鉴文本信息化,很多市、县只需要直接拿来就可以使用,无需重复开发建设。二是市、县两级的地方志工作机构的地方志鉴文本信息化建设经费没有保障。三是缺乏信息化人才,工作难以开展。市、县两级的志鉴文本信息化的发展存在着不充分、不均衡的状况,但这种不充分、不均衡的情况并不意味着发展趋势不对。信息化本身存在一个集约建设的问题,数据只有充分集中,才能体现价值,信息化才有作用。因此,市、县两级较少地进行志鉴文本信息化的工作,而由省级地方志工作机构代替其完成这部分工作,在现有条件下,是较为合理的发展模式。

各省志鉴文本信息化工作情况

经过对各省地方志工作机构的网站内容进行分析统计,得到各省志鉴文本信息化工作情况。通过各省级地方志工作机构的志鉴文本信息化情况分析,已经启动或准备实施志鉴文

本信息化是各省级地方志工作机构的普遍状态,但在完成的数量和形式上存在较大差异。在完成进度上存在一个差量化的区别,有的省已经基本完成省、市、县三级地方志书和综合年鉴的文本信息化初步处理,有的省还剩下部分地方志书和综合年鉴未进行文本信息化初步处理,有的省则刚刚开始起步。在表现电子文档的形式上也有较大差异,有的省采用网页纯文本展示,有的省采用双层PDF格式展示,有的省则还处于单层PDF展示状态。综合来说,各省已进入志鉴文本信息化建设大踏步前进的阶段。

经过对现有方志数据库的比对研究,将志鉴文本信息化的工作步骤划分为三个阶段,即由纸质化提升为数字化、由数字化整理为结构化、由结构化转变为智能化。通过现有情况和数据的分析,对志鉴文本信息化工作提出“三部曲”设想。

志鉴文本信息化的步骤解析

(一) 由纸质化提升为数字化

由纸质化提升为数字化,是志鉴文本信息化的第一步。纸质化,即书面化,以定稿印刷成册的形式承载志鉴的文本内容,是一种沿袭上千年的

形式。纸质化的优点和缺点都十分明显，优点是更具质感、立体感和厚重感，便于人的阅读和批注；缺点是不方便寻找特定数据、不利于携带、传播速度相对要慢等。

数字化，又称碎片化，存储介质由纸张变为电磁物质，其标志就是能实现文字内容可编辑与全文检索。前文涉及的采用单层PDF或图片来展示志鉴内容的形式，不属于志鉴文本信息化，因为其未能实现文字内容的可编辑，只是将纸质书籍转变为存储在电磁物质中的图片，只能算志鉴书页的信息化。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即完成了志鉴文本内容的扫描识别，实现了文字内容可编辑，但未能实现全文检索功能，因其并没有摆脱纸质化不方便寻找特定数据的特性，在此处将其定义为半数字化。由半数字化变为数字化，只需要对数据进行章节整理，然后按章节格式存储至数据库中即可。

实现由纸质化提升为数字化，大多数地方志机构采用的是扫描纸质书进行文字识别，然后进行机器及人工校对的工作流程，难以直接采用志鉴电子版文件。这是因为，第一轮出版的地方志书和早期的综合年鉴，大多数采用铅字印刷工艺，没有使用计算机排版，从而

也不存在所谓的电子版。虽然第二轮出版的地方志书和本世纪以来的综合年鉴基本采用计算机软件排版，但地方志工作机构并无志鉴资料定稿的电子文件，出版社或印刷厂提供的PDF文档也多数采用了转曲的排版工艺，已经将文档转换成了纯图片，里面的文字无法进行直接复制。

地方志工作机构实现志鉴文本内容数字化，主要有纯文本形式和双层PDF形式。有单独采用一种格式的，也有两种格式混用的，各有利弊。从存储空间上来看，纯文本格式的数字化工成果需要的存储空间小，双层PDF格式需要存储大量图片，要求更大存储空间。从网页加载速度上来看，纯文本格式的数字化工成果响应时间短，双层PDF格式加载需要更长的时间；从兼容性上看，纯文本格式具有更好的兼容性。双层PDF格式可能会存在两方面的兼容性问题，一是少部分电脑网页PDF文件加载不出来，二是复制PDF下层文字时会出现一些格式混乱的问题。从成果验收上看，纯文本格式验收更简便，因双层PDF格式的文字在下层，需要复制出来，粘贴到其他文字软件后，才能进行错误筛查；从学术需求的角度上来看，双层PDF格式展示内容和原书一致，有

效保存了书籍的原本样貌，方便用户获取引用资料所在页码。综合来看，纯文本格式在技术上更有优势，双层PDF格式在学术需求上更有优势。选取何种格式的方式进行加工，需要各地方志工作机构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进行分析判断。

（二）由数字化整理为结构化

数字化的文本数据进一步加工，可以成为结构化的数据。结构化指数数据排列具有规则性，有内在联系，其标志就是任何一个数据都有其对应的元数据（元数据，描述数据的数据，可视为数据的一种属性），且元数据保持相对固定不能随意发生变化。目前广泛使用的数据库MySQL、SQL Server、Oracle、Sybase等，都是结构化数据库，所以从广义上说，存储在数据库中的数据几乎都是结构化数据。大量数字化文本要实现全文检索功能，存储在数据库中是唯一的可行方式，因此数字化文本必然是结构化数据。但是数字化文本内容存储在数据库中的模式是将书的每一节或每一页的文本以长字段存储在数据库中，结构化的是志鉴书籍和志鉴的目录，元数据为书籍的章节或其他版权信息等，而不是志鉴文本中数据的结构化。此处所指需要进一步提升到结构

化，是指为数字化志鉴资料中的所有数据整理出相应代表的属性，以方便检索。

志鉴资料中，有三种类型的文本内容可以转换为结构化数据。

第一种就是表格。志书的体裁有序、述、记、志、传、图、表、录等，构成其基本框架。表格这一类型的数据按行列存储在数据库中，即可变为结构化数据，是志鉴资料可直接转换成结构化数据的内容。在志书的篇目中，除大事记之外，其余部分均有表格类型的数据存在。以某省《地理志》为例，在呈现该省人口的历史记载时，就从历朝历代的文献中整理出了16个反映从西汉至民国36年（1947）户口数据的表格，表格的标题列为该省的各行政区域，标题行省略，但根据内容可以推测为户数量和人数量。这个表格存储至数据库中，其内容即为结构化数据，表格的元数据为行政区域和数量。

第二种是志鉴资料中在同一段落或同一章节内以枚举的形式记录的相同属性的数据。仍然以某省《地理志》为例，第一章疆域文字部分最后一段的内容为：“全省90个县的面积，在5,000平方公里以上的有一个县；5,000平方公里以下4,000平方

公里以上的有四个县；4,000平方公里以下3,000平方公里以上的有十一个县；3,000平方公里以下2,000平方公里以上的有三十九个县；2,000平方公里以下1,000平方公里以上的有三十四个县，1,000平方公里以下的有一个县……”。通过观察，就可发现，文字部分每一句都在阐述行政区划的面积和数量，因此可提炼如下湖南县级行政区划面积大小数量统计表格。

面积 (平方千米)	县级行政区划数量
>5000	1
4000—5000	4
4000—3000	11
3000—2000	39
2000—1000	34
<1000	1

将该表格按行列存储至数据库，即可得到一组结构化数据。在第一种类型举例时提到的该省人口历史记载，其数据也是散列在各历史文献中，通过参与编纂的人员整理后形成的表格，然后才可直接存储至数据库中得结构化数据。虽然志鉴资料中有为数不少的表格，但是毕竟以叙述性文字内容为主，通过属性重复的文

字内容的整理，就能有效扩大志鉴文本结构化数据的数据量。

第三种就是分散于各篇目或部类之间的具有联系的文本内容。例如某省《年鉴》从1985卷开始，均刊载了政府工作报告，通过查阅各卷中的政府工作报告，得到1985年至1992年的全省国民生产总值（GNP）如下：三百四十四亿九千八百万元、392.64亿元、469.44亿元、584亿元、640.8亿元、703亿元、784亿元、900亿元，得到1993年至2018年的全省国内生产总值（地区GDP）如下：1192.41亿元、1694亿元、2640亿元、3000亿元、3211.4亿元、3407亿元、3692亿元、3983亿元、4340.9亿元、4634亿元、5612.3亿元、6500亿元、7493亿元、9145亿元、11000亿元、12930.7亿元、1.5万亿元、2万亿元、2.2万亿元、2.45万亿元、2.7万亿元、2.9万亿元、3.12万亿元、3.46万亿元、3.64万亿元。将这些年度性数据全部整理后汇总并存入数据库，即可得到一组随年度变化的结构化数据。

（三）由结构化转变为智能化

结构化的数据相比普通的数字化文本更加简洁明了，但数据的使用和分析仍然限定在单一结构化区域。如何实现结构化数据的跨区域联系，使

得结构化数据发挥最大的价值？目前现有的技术途径是人工智能（AI），即采取机器学习的方式，根据人类对志鉴数据的比较、判读方法形成算法，使用机器对数据进行不断分析和挖掘，提取数据中有价值的信息，通过机器的运算结果反馈优化算法，使数据智能化。其标志就是机器自发对数据进行处理和加工，形成优质的分析结果。

志鉴文本数据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具有很强的广泛性，但是数据深度不足。这与地方志的编纂方式有关，地方志的编纂有“众手成志”的说法，数据资料来源于社会各界，但是受限于地方志的篇幅，在每一个领域只能攫取最为紧要和概括性的数据。根据这一特点，实现志鉴文本数据的智能化最首要的方式就是对跨领域的数据进行比对和分析，并寻找其中的关联点。通过这些数据关联，为党委政府决策提供支撑，为各类研究人员提供全新的数据关联构造，方便研究人员能站在更高的维度去解读和分析需要解决的问题。举个例子来说，李克强总理任职辽宁省委书记时，喜欢通过耗电量、铁路货运量和贷款发放量三个指标分析当时辽宁省经济状况。因为GDP的统计较为复杂，存在

干扰数据或统计不完全数据的可能性，而这三项数据统计相对较为简单，通过工业用电量新增、铁路货运量新增和银行中长期贷款新增与GDP增长量之间的线性关系，可以很好地评估GDP统计的准确性。就志鉴文本数据来说，可以通过计算机分析已实现结构化的数据的曲线，建立起多个这样的数据模型，实现志鉴文本数据的智能化。在记录这些数据模型后，可以更进一步分析模型和模型之间的关联程度，建立起一套全新的解释话语，为社会公众提供高质量服务。

实现志鉴文本数据的智能化的第二种方式是引入数字人文技术。数字人文是近年来新兴起的概念，实际上，在人文领域引入计算机辅助研究已有很长的历史，数字人文是对这方面交叉关系的一个总概括，应用十分广泛。前文所阐述的建立结构化数据，实际上也是数字人文的一个方面。要实现志鉴文本数据智能化，可以引入部分数字人文的分析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利用。举例来说，可以通过抓取互联网的有关数据，建立链接关系，并和志鉴文本数据进行比对，打通志鉴文本数据和其他社会数据的联系。

三部曲之间的关系

由纸质化提升为数字化，是地方志鉴文本信息化基础阶段，对应中国哲学“物”的概念，为后续的信息化准备好充足的材料。强调的是通过扫描和识别两道工序进行数字化加工，虽然会耗费一些人工，但是在志鉴文本信息化三部曲里面，仍然是较为简单和基础的步骤。

由数字化整理为结构化，是地方志鉴文本信息化的发展阶段，对应中国哲学“器”的概念，通过基础阶段的材料，建立起不同的版块资源。强调的是通过人工建立起直观的数据联系，如果没有基础阶段实现志鉴数据的全文检索功能，那么发展阶段的结构化数据必然是不充分和不全面的。

由结构化转变为智能化，是地方志鉴文本信息化的高级阶段，对应中国哲学“用”的概念，通过发展阶段的版块资源，拼合起丰富的宏观空间。强调的是人工和机器的深度结合，结构化数据越充分和全面，智能分析的结果就越精准、越有效。需要注意的是，此处的智能并不意味的取代人工，人工智能有“越多人工、越多智能”的说法，要实现数据的整理

利用，必须投入大量人工进行数据清洗和核验。

概括来说，“物”“器”“用”三部曲的每一个阶段，都是下一阶段的基础。“物”和“器”都存在一定的“用”途，但是“器”的“用”途更加准确和方便，因此三部曲之间不存在绝对的、不可动摇的步骤顺序，但是只有“物”的丰富，才有“器”的充盈，最后“用”才能广泛、有效。

结 语

信息化技术是人类社会的先进生产力，将地方志与计算机技术、互联网技术深度融合起来，实现地方志鉴文本的信息化，既是地方志工作当前阶段的必然要求，也是决定地方志工作下一阶段的发展前景。过去因为诸多原因，地方志鉴文本的信息化水平整体仍停留在较浅的数字化层次。在地方志引入信息化技术的过程中，需要做好分阶段、分步骤的科学规划，在引入成熟技术的基础上，对新技术进行分析和研判，确保地方志工作紧跟前沿科技的步伐，不断繁荣壮大新时代地方志事业。

（作者单位：湖南省地方志编纂院）

试论如何将地方志融入高中教育教学研究

——以温州地区为例

◇ 谭桂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高度重视修史修志，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地方志工作提质增效，离不开队伍优化、体例完善、条目规整、素材精选等，即围绕“修好地方志”精耕细作。同时，也离不开历史经验总结、区域文化挖掘、地方精神提炼、宣传效度提高等，即聚焦“用好地方志”拓宽思路。将宣教工作向纵深推进，需注意受众群体差异性。处于价值观塑造、思想认知形成、道德品质养成关键阶段的高中生，应是地方志宣教重点发力群体之一。高中生从地方志中汲取精神营养，有助于把握方向、涵养正气、提升境界，从而进一步抵制历史虚无主义、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消极思想，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做更优秀的新时代青少年。

温州地方志简述

温州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是

东瓯文明故地、永嘉学派摇篮、改革开放先行区。地方志书编修可溯及南北朝时期刘宋郑缉之编撰的《永嘉郡记》。隋唐时期，官修志书制度化，温州地方志以“图经”形式呈现。宋代，温州地方志编修进入兴盛阶段，并在全国居领先水准，《祥符温州图经》《温州图经》《永嘉谱》《永嘉志》《乐清县志》《乐清县图经》《永宁编》等成果相继出现。明代，温州编修府志5种、县志15种，不乏佳作。其中，50万字的弘治朝《温州府志》在框架体例、资料累积、行文表述等方面均具有较高借鉴价值。清代，温州编修府志5种、县志29种。其中，康雍乾三朝国力雄厚，史籍编修处于盛世的好时机，成果迭出。民国时期，时局动荡，经济凋敝，民生困苦，地方志书编修也受时代影响，除校补光绪《乐清县志》、乾隆《温州府志》外，仅新编《平阳县志》。

新中国成立后，温州史志事业迎来真正春天。1996年，《温州市志》第一轮修志工作顺利完成，记述下限为1990年，章志诚任主编；2020年，温州市二轮修志圆满完成。全志共800余万字，是温州历史上单体量最大之文字工程，张声和任主编。《温州年鉴》曾获首届中国地方志年鉴奖特等奖、全国年鉴编纂出版质量评比特等奖等荣誉，编纂质量不断提高。中共温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志办）主办的期刊《温州史志》，除展现地方史志最新研究成果、萃集原始文献外，还刊载地方学者对地方志编修的理论研究成果。

地方志是一个区域的“百科全书”。温州地方志时间跨度大，内容涵盖广，是呈现温州自古及今经济发展、制度沿革、文化传承、地理变迁、习俗移易的宝贵工具书，具有史料保存、施政参考、情怀熏陶、思想教育等多维度价值。

温州地方志的高中教育教学价值

（一）坚定区域发展自信，厚植家国情怀

区域发展自信是文化软实力重要组成部分，对精神提振、潜能挖掘、招

才引才、产业集聚等具有显著影响。一定意义上，发展自信是区域崛起的精气神。瓯居海中，早期温州创造出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一片繁华海上头”，唐宋以后，温州在手工技艺、商品经济、海外贸易等领域成绩蔚为可观；近代，孙诒让、宋恕、陈虬、陈黻宸等乡贤在时代舞台上演奏出华美人生乐章；改革开放以来，温州人敢为人先、守正创新，铸造一个个“全国第一”品牌，开创举世瞩目的“温州模式”，这一切，都将成为温州区域发展自信的重要组成部分。

地方志书见证着温州人以智慧与力行书写的一个个亮点，例如温州泰顺“共富大搬迁”。泰顺是温州南部属县，是典型的山区县，曾是国家级贫困县。但当地人以“山一般硬气”的精气神，走出特色崛起之路。“一镇带三乡”“无区域生态移民”“生态大搬迁”“共富大搬迁”等改革方法，均在全省乃至全国率先推出。2018年，该县生态搬迁机制改革获评省公共管理创新十佳案例。2019年，该县获批农业农村部“人口集聚与农民增收致富改革试点”。2021年，司前镇获评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共富大搬迁（生态大搬迁）可谓“在实践中探索出易地搬迁的有效路径”。将此类亮点纳入高中教育

视阈，可以点燃高中生对家乡发展的自信。家国本一体，家乡振兴与祖国发展始终同频共振，学生可以进而厚植家国情怀。

（二）发挥乡贤榜样作用，端正价值取向

乡贤事迹是地方志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千百年来，温州政商学各界均出现一批品格高尚、能力突出的精英。仅近代，温州就有谢文锦、郑恻尘、胡识因、刘绍宽、王理孚、梅冷生、黄群、黄光、杨青、孙宣等享有盛誉的乡贤。从文化人类学角度看，乡贤不仅是自然人，亦是一种文化符号。历代乡贤胸怀理想、心向远方，以实际行动演绎可贵思想。或怀着兼济天下之志，勤政敬业；或遨游商海，善行天下；或在学术殿堂撷取智慧之果；或醉心技艺，传承文化遗产。他们在本地家喻户晓，作为“家门的榜样”，在激励引导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乡贤精神助推良好社会风气形成，在温州早有历史传统。宋朝时期，平阳士人周坦、徐俨夫在三年内相继高中状元。当地歌颂“选首连年擢大廷，征书一夕动文星”。受到榜样的激励，周围的人更加努力，形成崇文尚学、积极进取的社会风貌。“里居自昔表登瀛，科举人传十八名。习俗尚怜青紫

贵，月明两岸读书声”的记载，即是见证。时代虽别，事理则一。此理古今则一。而且，作为土生土长的人才，乡贤在成长环境、儿时经历、文化心理、思维模式、行为方式等方面，往往能使人们看到“自己的影子”，从而更加乐于借鉴学习。某种程度上，乡贤某些成功做法可以“复制”。对于处于价值观形成关键期的高中生而言，以乡贤为范，可以进一步端正人生观、价值观。

（三）拓展教育工作空间，推动整体发展

地方志作为带着乡土气息的文化“土特产”，高中生对其会感到亲切、熟悉，是“家门口”的宝贵资源。同时，地方志作为“一方之全史”，于域内自然地理、人文历史等几无不包，这为高中很多学科开发相关校本课程提供素材。以地理学科为例，地方志中有介绍的乐清雁荡山、瑞安飞云江、永嘉楠溪江、泰顺乌岩岭等均是具有较高熟悉度与研究价值的自然景点，本身也是承载着丰富信息的教科书，与高中教材知识有诸多衔接联系之处。开发相关校本课程，能够引导学生树立正确资源观、环境观、发展观。以历史学科为例，地方志中丰富的人物事迹、历史典故、典章制度等，都是校本课程开发的肥沃

土壤。党建与德育方面，地方志中记载的丰富的红色文化，能够提高德育课程化水平，并使党史学习教育更具特色。教育素材拓宽相伴而生的是教学方式多元化，教师可根据课程特点，采取个性化教学方式，如参观考察、动手实践、田野调查、谈话访问、文体活动等，使学生有更多情感体验及实践参与。

地方志资源亦可用于校园文化景观、校容校貌优化。标志性雕塑、宣传展板、橱窗、学科教室、各功能室、灯箱、墙体等均可作为德育载体，使学生在浓厚文化氛围中感悟体验，起到润物无声、熏陶浸润效果。地方志的融入，将使学校与史志部门、文史学者联系加强，增进合力、启发互鉴、使高中在德育、教学等领域打开新视窗。

温州地方志融入 高中教育教学的理论基础

将地方志融入高中教育教学，推动“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实，不仅有一定实践基础，而且符合教育教学理论。该举措立足区域特色文化，将教师主导作用与学生主体地位结合，在实施中凸显教育生命力。

（一）人本主义教学理论

该理论代表人物有马斯洛、罗杰斯等，关注人类尊严与价值、创造力与自我实现。马斯洛表示，“与人有关的目的在根本上就是人的‘自我实现’”，强调教育本质目的是实现人类全面发展。具体到高中生学习，该理论认为，作为学习活动主体的学生，应受充分尊重。罗杰斯提倡，教学过程中要发展学生个性，调动学习内驱力。温州地方志主要内容为富有地方特色的事物，学生对其兴趣度高、亲切感强，能从中挖掘知识信息，增加对家乡了解、加深乡土情感。根据该理论，高中教育教学可有机运用地方志这一特色资源，满足学生兴趣需要，使学生将知识和情感价值融会贯通，加快自我发展。

（二）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该理论着眼学生认知发展与学习之间的关系，由知识观、学习观与教学观构成。知识观认为，学生在自身经验基础上建构新知；学习观认为，学生接受新知识、新信息，是以既有知识、经验为基础；教学观认为，教师作为学生学习引导者与帮助者，必须制订适切学情的方案，以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该理论高度关注学生学习情境性及基础性。尽管学生对温

州地方志缺乏深入了解,但对志书中记述的地点、事物、习俗相对熟悉。高中德育与学科教学中,将该资源纳入教学素材,能使学生重温已有经验、已会知识,将新旧知识有机结合,助推理解新知识。教师也可发挥引导者作用,创设良好教学情境,助推学生构建新知识体系。

(三) 后现代主义教学理论

该理论提出于20世纪60年代,兴起于欧美国家,并产生广泛影响。该理论课程观认为,课堂应培养学生发散性、多元化思维,要重视个体差异性,并基于差异提供多元性学习内容,以帮助学生个性发展。教学观强调,教师应该不断创新教学策略,在教学实践中孕育研究型教师,能够开展创造性教学。将地方志运用于高中教育教学,考虑到乡土特色,考虑到学生特有感情,丰富学习内容。教师可提高搜集材料能力,强化科研意识,提高专业素质。

温州地方志融入 高中教育教学的路径

脚下土地,承载厚重历史;乡邦文献,蕴含桑梓文化。地方志是区域文化的载体,是高中生培育核心素养

的重要依托。其融入高中教育教学的路径,至少有以下几种:

(一) 拓宽视野,优化宣传阵地

宣传工作是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营造积极向上的校风学风的关键环节。提高宣传效果,凸显宣传特色,离不开新文化资源。可以查阅地方志,将其中先进楷模、具有宣教意义的故事等作为素材,融入走廊、党员活动室、教师办公室、宣传橱窗、灯箱等,使广大同学在潜移默化中了解家乡文化,激发学习兴趣,强化赓续传承意识。

除传统阵地之外,还应重视新媒体作用。新媒体有普及率高、传播便捷、功能齐全等特点。可以运用现代信息技术,组建QQ群、微信群等,推广温州文化精髓,以生动活泼的形式和内容开展网络教育。启动“温州地方志文化进校园”网络工程,运用微信公众号、校园网等新式平台,定期推送温州乡贤事迹、温州革命故事,或介绍相关遗址遗迹,让广大青年学子更多了解与热爱温州,以正能量占领网络宣传高地,抵制不良文化,引领舆论方向。

(二) 依托资源,打造品牌活动

优化高中德育工作,凸显亮点,凝练品牌,需要丰富文化内涵。地方

志蕴含的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先进文化，是浸润心灵、增添动力的宝贵资源。

高中学子精力充沛、富于激情。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的教育形式，更容易提高参与度。依托地方志资源，开展“家乡历史文化知识竞赛”“家乡革命故事大赛”“红色歌曲歌唱大赛”“与革命亲历者面对面”“家乡红色故事漫画展”“课本剧表演”等活动，更容易让学生接受，注入进步思想。还可举办专题讲座，如“孙诒让与温州区域文化”“温独支革命活动与精神”“红十三军在温州的辉煌历程”等；举办“环境保护从我做起”主题班会，利用“温州大水缸”飞云湖开发的故事教育学生尊重自然、保护环境及人与自然是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观念。地方志资源化还可融入户外研学。例如，引导学生通过走访廊桥文化园，更加深入了解廊桥，体会非遗文化魅力，认识到在保持经济持续发展的同时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通过飞云湖水库野外研习，感受保护水源的重要性，使之带着更强烈的责任感，自觉加入保护水源行列。

（三）运用素材，推进课堂变革

立足课改背景，推动基于学习力提升的课堂变革，离不开对新教学素材的选取与运用。高中很多学科均可从地

方志中获取教学资源。以历史学科为例，教师可根据课堂需要，创设形式多样的问题情境，激发学生探究欲，从地方志中筛选学生相对熟悉亲切的地方史料，将晦涩难懂的知识形象化。例如，科举制是高中历史教学重点，在教学中，我们可以利用温州学生比较熟悉的楠溪江一带的古楹联、族规家训作为教学素材，如芙蓉村《陈氏宗谱》中族训教导子弟“笃志苦学，以求仕进”，教师可更多地去利用身边的史料去讲好“科举制的影响”。

提高学生参与度、培养合作探究能力，是教学的关键着力点。教师可引导学生适当分组、加强合作，对地方志史料进行搜集，运用科学思维对其提炼、归纳、分析、推理等。该过程不仅授之以“鱼”，更授以“渔”。例如，讲述“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时，可提前安排任务，引导学生利用课余时间，翻阅地方志，结合旧照片、相关视频、口述访谈等，呈现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温州农村经济的发展历程，以PPT或其他形式开展分组汇报展示调研结果，最后再由教师对汇报进行总结提升。该过程，地方志作为工具，可使学生锻炼搜集与辨析史料能力、提高合作意识、加强团队精神、提升探究能力，助推学科核心

素质培养。

（四）突出特色，开发校本课程

校本课程是对国家与地方课程的有机补充，是办学特色与学校文化的体现。开发校本课程应着眼地方特色，挖掘优势资源，立足校情，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量体裁衣”进行编制、实施与评价。做到“人无我有”，避免千篇一律，让学生能够吸收到独特营养。

以笔者所在的泰顺某校为例，该校地理及生物老师利用课余时间，将地方志记载的资料与教师所做的实地考察相结合，整理推出一些介绍本地自然资源景观的校本课程，如《泰顺地理》《丰富的中草药》《泰顺水电开发》《乌岩岭物种多样性》等，教师在介绍自然地理和生物知识过程中，展现家乡优美的自然风光，使青年学生感悟家乡美，激发爱乡情感，强化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观念。温州地方志内容丰富，以之为基础，综合其他资料，可开发的校本课程可以有很多门类。在开发过程中，应遵循深悉学情、契合学生需求的原则，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以之为发力点，使之成为推动教师专业成长、促进学生学力提升、改善学校硬件配备、创新教育教学理念、优化课堂模式的抓手

之一，进而加快整体发展。

余 论

立德树人，百年大计；修志问道，以启未来。地方志编修与宣教，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功在当下，利在千秋。高中生培养与教育事业发展，关乎国家与民族未来。当前温州地方史志工作已取得累累硕果，志书编写、文献辑录、成果推广等均可为人称道。高中教育教学变革力度不断加大，“学在温州”教育品牌愈加闪亮。但地方志与高中教育教学的融合力度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地方志进校园的意义、原则、路径等均值得进一步探究。这项工作的开展，能够在“用好地方志”的同时，使“立德树人”任务贯彻地更有特色与深度。温州地方志融入高中教育教学是手段而非目的，地方志成果卷帙浩繁，教师筛选时，要明确目标、围绕重点，提高针对性，避免为融入而融入；结合“双减”背景，以提高学生兴趣、提升学生能力为归旨，避免加重学生负担。本文所论尚显肤浅，倘能引发学界师长、同仁对该问题关注，则是笔者之期盼。

（作者系浙江省泰顺中学教师）

永远跟党走

◇ 刘锡荣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可喜可贺！

我是遗腹子，父亲刘英烈士在我出生前两天英勇就义了。解放前，我跟随母亲在南征北战的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总留守处部队长大。我自幼体弱，在南京读小学时患上肺结核，休学卧床三整年，母亲丁魁梅对我悉心照顾，十分疼爱。记得上初中时，她怕我走路上学累，就给我买了一辆自行车，这在当时的中学生中是很少见的。

1963年秋天，我和众多新生一样，满怀着好奇和憧憬，踏进了风景秀丽的浙江农业大学华家池校园。碧绿清澈的华家池水吸引了我。盛夏酷暑晚自修后，我常会独自一人下水学游泳，经过一段时间点勤学苦练，我不仅熟练掌握了游泳的技巧，还代表校班参加了杭州市为纪念毛主席横渡长江而举办的横渡钱塘江活动。第一次游过800米的江面，不知喝了几口

水，总算游到对岸，最后还获得一枚纪念章。从此胆子越来越大，时间也越来越游越长，最后离校时已发展为冬泳。冬泳成为了我的习惯，一直到2000年1月调到北京中央纪委工作后才停止。

刚进入大学的时候，第一次见到了这么多知识渊博、诲人不倦、教书育人、甘当红烛的教授、讲师、助教，他们从理论到实践，深入浅出、生动活泼、启发式的讲课，激起了我探索专业知识的欲望。不仅是在课堂上，老师们还深入宿舍，辅导学习上有困难的同学，使我们深受感动和激励。

在农大桑园和蚕桑馆，我第一次挥耙翻土，挑大粪、耕培桑园。一年数季养蚕，夜里多次起床，挑灯理桑，喂养蚕宝宝。在最开始的时候，我挑不动一整桶的大粪，只能挑半桶，或与人合抬一桶。一年下来，随着体质增强，也能一人挑满一担粪

了。后来我才知道，我国千百年来在全球与茶叶、陶瓷共享盛名的丝绸如此来之不易，寸寸蚕丝凝聚了广大农民纺织工人的智慧和血汗，让我深受震撼教育。是劳动创造了人类世界，劳动人民伟大！我渐渐地爱上了这个专业。

一年暑假，我和同班同学徐周良，自愿报名去淳安县唐村帮助农民养了一季柞蚕。柞蚕是在户外露天柞林中放养的一种蚕，专吃柞叶。柞蚕丝拉力大，是专做降落伞的蚕丝。我们和当地农民一起，爬上高山柞林放养柞蚕。每人自带两个大茶杯，一个烧饭，一个烧竹笋野菜，有时能放两片咸肉调味。晚上睡在用柴刀砍去小枝杈铺成的一排树枝上，如有茅草压一点盖在上面还能软一点。第二天醒来一看，全身都是树枝砍刀砍后留下的凸出挤压的红印子。我和徐周良在山上坚持了近两个月，总算把一季柞蚕养下来了，皮肤晒得乌黑，还得了一个“登山虎”的外号。

大学期间，全国正在开展学习《毛泽东选集》和“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热潮。校系党团组织也积极组织开展宣传学习活动。我有幸从妈妈那里得到一套精装毛选一至四卷合订本，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起来。由于

我理论水平低，又缺乏历史常识，所以一开始阅读很慢，有时还要到处查找资料，遇到难处时，一天也读不了几页。但我依旧锲而不舍，再忙再累一天也要读一点。三年下来，我终于将毛选一至四卷通读了一遍。对于中国共产党在马列主义理论指导下，领导中国进行艰苦卓绝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有了一个较全面系统的了解。同时，也对于父亲为之奋斗献身事业的价值有了更深切的体会和领悟。

一天，系政治辅导员吕汉甫老师突然提出晚上要带我去剧院看《红灯记》。这是一家没有血缘关系的三代人为了共同奋斗目标走到一起，组成比亲人还要亲的革命家庭的动人故事。回校路上，我幡然醒悟，让我看这场戏不正是组织上引导我要像主人公那样，接过爹爹手中红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啊！我已入团多年，理应争取早日入党。我立即草拟了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报告，希望更多地接受党组织的教育、培养与考验。从此，我更主动积极参加党团活动。在被推选为系学生会负责人后，我组织开展各种生动活泼的学习和文体活

动，出好每期黑板报、墙报，还排演了《红岩》话剧，获得了全体师生的的一致好评。

1965年9月，经系党总支书记吴希新和政治辅导员吴薛藤老师介绍，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激动兴奋的心情正如父亲入党时在《备忘录》中写下的那句感人肺腑的话：

“共产党这是一个极为珍贵的名词，我加入了共产党，做了共产党员，我是如何地引以为荣呀！从此我的一切，直至我的生命都交给党去了。”父亲用年轻的生命实践了他的铮铮誓言。

一个月后，我爱人詹黛薇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虽然是我浙农大同届同学，但是一开始我们俩并不相识。1965年，她被选为全国学联第十八次代表大会（简称学代会）代表，受到毛主席、周恩来、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我在她回校传达大会精神时见到了她。詹黛薇因任校学生会副主席，分管文娱工作，我作为系学生会负责人，在对接工作的过程中认识了她。

1966年1月20日，经团省委批准，我和詹黛薇同时任共青团浙江农业大学第二届委员会副书记。从此两人工作上接触增多，相互也更了解一些。

1968年夏，我俩一起从农大毕业，都被分配到安吉县工作。那年，所有毕业大学生都先到农林场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俩在安吉县交往中关系从相识相知相敬发展到相爱相恋。1969年7月1日，我俩到永康市方岩父亲陵墓前祭扫并举行婚礼，徐周良作为伴郎出席，在场的还有村大队党支部程书记和一些帮忙扎花圈的农民。我俩在墓前誓言：无论今后人生的道路多么曲折艰难，一定以革命先辈为榜样，对党对祖国对人民始终不悔；终生互敬互爱，白头偕老。

回顾自己的工作经历，在安吉县学习劳动锻炼工作5年，在省农委（农办）工作9年，1981年至1991年在温州市工作10年，1991年至2000年在浙江省纪委、浙江省政府、浙江省委工作9年，2000年1月到中纪委工作，2008年3月到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委员会工作，2013年退休。退休后，趁着身体尚健，陪老伴通过旅行社自费游览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又开始了周游各国的旅程。未料天有不测风云，2019年3月16日，我因脑出血晕倒在万寿路游泳馆，幸得中央纪委领导同志关怀厚爱、医务工作者精心医治、浙江驻京办领导同志关心看望、亲朋好友细心照顾，目前我身体已经

基本恢复。

每当我抚心自问：我为什么能康乐地活到今天，为什么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为什么会力所能及地为党、祖国和人民做一点具体有益的工作，为什么能问心无愧地从领导岗位退下来……水有源，树有根。是党的教育培养给我从健康、学识、品德、社会活动能力等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更关键的是给了我政治生命，使我能稳健走向为人民服务的征途和幸福的人生之路。

今年，党迎来百年华诞，我和老伴儿也将迎来入党五十六周年、结婚五十二周年纪念。当组织上把金光闪闪的“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挂在我 and 老伴儿身上时，心情十分激动和无上荣光！回顾历史，我们党这100年走过的历程非常不容易，确实伟大、光荣、正确。特别是我国现在的经济总

量排在世界第二，国际地位大大提高了，真让国人感到扬眉吐气。这进一步证明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改革开放就不能发展中国，证明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运用马列主义对我们党100年历史实践的理论总结。只要坚持并认真践行这些理论，我们就能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红色道路阔步前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一定能实现！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我和老伴詹黛薇及全家用这首传唱祖国大江南北的红歌来表达在党百年华诞时刻的信心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跟党走！

（作者系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

冰天雪地祭英雄

——电影《长津湖》观后感

◇ 彭松生

《长津湖》这部影片，以抗美援朝战争中的长津湖战役为背景，讲述了在极寒严酷的环境下，中国人民志愿军东线作战部队凭着钢铁的意志和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扭转战场态势，为最后的胜利作出重要贡献的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1950年11月27日至12月24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9兵团3个军，以及20军、26军官兵在9兵团司令员宋时轮的指挥下，于艰难困苦的情境中，与武器装备世界一流、战功显赫的美军第10军在朝鲜长津湖地区进行直接较量。这次战役，收复了“三八线”以北的东部广大地区，并创造了抗美援朝战争中全歼美军一个整团的纪录，迫使美军王牌部队经历了建队以来“路程最长的退却”。志愿军在东西两线同时大捷，一举扭转了战场态势，成为朝鲜战争的拐点，为最终到

来的停战谈判奠定了基础。为了这扭转局势的关键一战，中国人民志愿军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在零下三十多摄氏度的极端天气中，很多战士是以端着枪的姿势被冻死，后被誉为“英雄冰雕连”，体现了志愿军战士服从命令视死如归、决不退缩的革命精神。

电影里，有一个场景是，连长伍千里带队成功破坏了敌人的通信塔，当他们在清理战场上所获的装备时，突然听到飞机的声音。不久，敌军就成功在那个地方投下了标识弹，随着标识弹的不断燃烧，敌军一架又一架的飞机也随之而来。紧接着，敌军投下一颗又一颗的炸弹。就在这关键时刻，“雷公”为了不让更多的战士牺牲，他毅然决然地拔起地上烧得通红的标识弹，抱在车上，一个人开着车往另一方向驶去。他成功的转移了敌军的战火，但也在此次行动中不幸牺牲。还有一个场景，是20

军的著名战斗英雄杨根思所在的那一个排坚守阵地，多次击退敌人。到最后整个排只剩下他一个人时，他在倒下的战友身上拿起炸药包，毅然决然的冲向敌人的方向。虽然他在此次战役中不幸牺牲了，但他的精神名垂青史，万古流芳！

这场长津湖战役，正是有志愿军战士寸土不让、同仇敌忾的精神，才让战争的天平由此逆转，而在这卓绝战功的背后，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用不屈的意志，铸成的钢铁防线。这是志愿军战士用自己的身躯在苦寒之地立起的血肉“长城”，御敌于外、退敌千里，守住家国安宁，换来长久和平。

冰雪冻住了战士们的躯体，却封不住他们不朽的军魂。这军魂，是对国家和民族最澄澈的爱；这军魂，是军纪如山，是铁流浩荡。“冰雪啊！我决不屈服于你，哪怕是冻死，我也要高傲地耸立在我的阵地！”长津湖，也曾绵延冰封，也曾静水流深，岁月可证，流水有声，那是伟大斗士的号角，那是铁血军魂的咆哮，那是志愿军战士高唱革命英雄主义和国际主义的赞歌！

长津湖一役，雄浑苍凉、动人心魄。纵使过去了71年，这场惨烈的、



《长津湖》电影海报

英勇的血战仍在迸发着蓬勃的力量，化作一座丰碑，时刻提醒大家铭记长津湖的冰雪，铭记冰雪里那群“最可爱的人”，和他们身上那不朽的军魂！

看完影片，我不禁回想起自己的军旅生涯。1969年3月18日，我不满17岁。那天，我来到了江苏省镇江地区句容县高丽山，光荣地加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7军81师243团当中。在新兵排训练半个月后，我被分配到该团特务连警卫排三班当警卫战士。记得1969年4月20日，那是我入伍后第一次

到团司令部值班。那会儿，警卫员除有特殊任务，其余时间都轮流到团部值班，一值就是一个星期。值班的任务主要是照顾团首长们的工作与生活起居。我根据老班长陈顺余的吩咐，先对团首长的办公室逐一进行卫生清洁。当我刚给团副政委高培典办公室清理完毕时，他已提着公文包前来上班了。他看到我以后，突然好奇地瞪大眼睛看着我，说：“小鬼，你是刚入伍的新战士吧！”我赶忙作了自我介绍。高副政委，四十多岁，中等个，胖胖的身材，满脸络腮胡子，眼睛大大的，一口浓重的山东胶东口音使人感到尤为亲切、朴实。他双眼一直盯着我，自言自语道：“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像的人呢？”他亲切地拉住我的手，叫我坐在椅子上，给我讲起了抗美援朝战争那段惊心动魄的往事……

朝鲜战争时，高培典副政委任我志愿军某部的连指导员。连队的通讯员姓张，当年也是17岁，高副政委说与我长得一模一样，个子也差不多。小张平时性格活泼，工作主动，脑瓜挺机灵，作战十分勇敢，深得全连官兵的喜爱。在一次战斗中，小张腿部负伤，由于战况激烈未及时得到医治，只能勉强跟着队伍走。一次，高

培典的连队被美军一个营外加南朝鲜李承晚部队发现，并迅速包围过来。为了摆脱敌人追杀，高培典和连长当即决定：全连官兵要以最快的速度奔跑，立即向安全地带转移。由于小张他负伤跑不动，没跟二、三里地就掉队了。此时，小张已意识到自己跟不上了，吃力地对高培典他们说：“连长、指导员，你们带着队伍赶快跑，不要管我了。”“不，我们一定要带你走。”高培典和连长当即下令两个战士扶着小张一起跑。“连长、指导员，你不能为了我牺牲全连100多个战友啊，我最后一次求求你们了！”小张含着热泪求高培典和连长赶快带领全连官兵脱离险区，把死亡留给自己，把生的希望留给战友。此时，已万不得已，高培典他们只好放弃小张，带着队伍冲出了敌人包围圈。还没跑多远，后面传来“啪啪”两声枪响，小张同志当场倒在敌人枪口下，英勇牺牲。

听了高副政委的这段真实的战斗经历，我被小张同志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舍生忘死、视死如归的英雄行为深深感动。他的牺牲，充分展示了我志愿军战士“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革命精神的风采。同时，也为战争的残酷感到震撼。高副政委表情严肃但又

亲切地对我说：“作为一名解放军战士，随时都要准备上战场，投入到保卫祖国的战斗行列里。小彭，希望你今后也要向小张同志学习，好好磨练杀敌本领，不怕困难、不怕牺牲，锻炼自己的意志，随时听从党和毛主席的命令，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抗美援朝战争胜利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人民已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新的

进程。前进的道路上，要继承革命英烈的光辉遗志，弘扬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倍加珍惜革命英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和平环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忠魂不泯，浩气长存。近20万中国人民志愿军英烈的功绩彪炳千秋，英烈们的光辉名字万古流芳。他们的英雄业绩将永远与祖国山河同在，与祖国人民同在，与日月星辰同辉！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为祖国而战，为援助朝鲜人民而战，为保卫世界和平而战，光荣牺牲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们永垂不朽！

（作者系温州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会员）

陈经正、陈经邦生平事迹考

◇ 陈 彤

平阳县南雁荡山会文书院的创始人，是北宋后期洛学名儒陈经正、陈经邦兄弟。乾隆《平阳县志》有载：

“会文书院，……在雁荡山，陈经正等读书处。”明清之际学术史巨著《宋元学案》，更对陈经正、陈经邦的学术地位作了权威叙述。其卷三二《周许诸儒学案》曰：“陈经正，字贵一，平阳人也，与其弟经邦从伊川（程颐）游。……经邦成大观进士，字贵新。贵一、贵新皆有问答，见《（二程）语录》。……平阳学统始于（二陈）先生兄弟。”作为程门弟子、平阳学统发端者，二陈先生在平阳文化史享有崇高地位，但历代史志对其生平事迹语焉不详，以致学界对其籍贯与会文书院属地意见分歧，给地方文史研究带来一定困惑。本文谨以现有文献档案为依据，结合北宋教育、科举、任官等制度，深入考证二陈先生生平事迹，探求会文书院创建历史真相。

籍贯与迁徙

陈经正、陈经邦籍贯有乐溪、浦源二说。

两宋之际名臣兼学者许景衡《横塘集·陈府君墓志铭》载：“平阳陈经德（经邦长兄）状其祖（陈宗伟）府君之行，告其所游许某（景衡）曰：‘惟陈氏世为温人。’……（其祖父陈宗伟）葬于所居（平阳县）宰清乡乐溪村之原。”两宋之际理学家杨时《龟山集·陈君玉墓志铭》亦载：“君（经邦之父）讳某（士珪），字君玉，温州平阳人也。……葬君（陈士珪，经邦之父）于乐溪大岭之原。”许景衡、杨时与经正、经邦同为程门弟子，相知甚深，所撰墓铭明确记载二陈家族“世为温人”，“居（平阳县）宰清乡乐溪村”，此两条史料是二陈先生籍贯铁证。但在500多年之后，明人郑思恭所著《东

《东昆仰止录》却出现了关于陈经正籍贯的歧说：“贵一陈公（经正），（慕贤东乡）浦源人。”宋代平阳县宰清乡乐溪村，即今平阳县水头镇鹤溪社区中元村；慕贤东乡浦源村，即今龙港市平等社区陈家宅村。两地古属同县，今隔鸿沟。

针对以上两说，早在100年前，民国《平阳县志》即据与二陈先生同时代的许景衡、杨时所撰陈经邦父祖墓志，否定了浦源之说。其人物志载：“陈经德（经邦长兄），宰清乡乐溪人。”许景衡、杨时所撰北宋墓志世系清晰，班班可考，非明末《东昆仰止录》所能推翻，民国《平阳县志》对此考证甚为精详，因而今人于二陈先生籍贯，不宜再有争议。

相对于《东昆仰止录》误记“贵一陈公，浦源人”，康熙、乾隆《平阳县志》所载“陈经正，字贵一，居浦源”与许景衡、杨时所撰墓志尚无抵触，甚有可能。所谓“居浦源”，乃为徙居浦源之意。陈经正籍贯确在乐溪，但其或如康、乾县志所述于晚年（或中年）迁徙浦源，二者均有史料依据，且相互之间并无矛盾。

而经邦、经正并非亲兄弟，经正或徙浦源，经邦未离乐溪。据《陈君玉墓志铭》载：“（经邦之父士珪）疾已

革，召诸子（经邦亲兄弟三人）而戒之曰：‘汝等慎无析居，为鄙俗常态。’义方之训，死犹不忘。”宋人甚重孝道，陈士珪嘱诸子“慎无析居”，陈经邦“义方之训，死犹不忘”，岂能迁离乐溪而远徙浦源？可见经邦兄弟三人始终聚居于乐溪。因此，对于浦源“为陈经邦立”进士坊，民国《平阳县志·古迹志》断言：“此盖后裔追建。”今网传所谓“陈经邦由北港鹤溪来迁，而为浦源肇基始祖”之说违背史实，不可采信。

生年与入太学时间

《陈君玉墓志铭》载：“（大观三年），经邦始以（太学）上舍赐第。”民国《平阳县志·人物志》亦载：“（陈）经德与弟经邦，从弟经郛、经正俱游太学。”据此可知，陈经正、陈经邦均为太学生。

史学界过去曾大致推测，陈经正、陈经邦兄弟是在宋徽宗建中靖国和崇宁年间（1101—1106）入太学的。现经考证，陈经邦确于崇宁元年（1102）补入太学，但陈经正却是宋哲宗元符二年（1099）十二月补入太学。理由有三。

一是《二程外书》所载，指向建

中靖国元年（1101）或更早。《二程外书》卷一一载：“谢显道（良佐）建中（靖国）间（1101）上殿不称旨，先生闻之喜。已而，就监门之职。陈贵一（经正）问：‘谢显道如何人？’先生曰：‘由、求之徒。’”据此可知，经正入太学的时间，最晚应在建中靖国元年（1101）或之前。

二是许景衡所撰陈宗伟墓志，指向了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或更早。墓志称：“平阳陈经德状其祖府君之行，告其所游许某（景衡）。 ”明确说陈经德游学于许景衡。而在那段时间，许景衡仅于元符三年（1100）在京城。许景衡《横塘集·郭璋画跋》：“元符三年，余将西游京师，璋父子遗余西域像。”《横塘集·小简·与张帅·三》：“今春至京师。”此前此后，许景衡分别在台州黄岩、河北乐寿任县尉。因此，至晚在元符三年（1100），陈经德便已在河南开封读太学了。

三是《宋会要辑稿》相关记载，直接指向元符二年（1099）十二月。《宋会要辑稿·郡县学政和学规》载：（元符）二年（1099）十一月二十七日，诏：“诸州学生，依太学三舍法，限当年十二月到京，随太学补试。”

据以上史料可判断，陈经正与

其从兄陈经德，是于宋哲宗元符二年（1099）十二月，作为温州州学所荐上舍生，依照太学三舍法，应诏到京，参加太学补试后，次年春季正式补入太学外舍。考虑到平阳至开封有3500里路，所以，他俩应在当年秋季就已从平阳乐溪启程北上。

而陈经邦入太学时间要迟两年，是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春季才入学。理由亦有三。

第一，杨时所撰墓志载：宋徽宗大观三年（1109）三月廿一，陈经邦以太学上舍生登进士第。这说明经邦太学毕业于大观三年三月前。徽宗时期，太学学制约在5年至7年之间。从大观三年（1109）起倒推7年，经邦入太学时间，最早不能早于崇宁元年（1102）。

第二，陈经邦是在太学期间见到程颐先生的，《二程外书》卷一一也记载了经邦与程颐先生就《诗说》观点的一段面对面的对话。而《续资治通鉴》卷八八载：崇宁二年（1103）四月卅，皇帝诏曰：“追毁程颐出身以来文字，除名。”还勒令程颐“尽逐学徒”。程颐当时被迫迁居洛阳龙门之南，要求各地学生“不必及吾门也”。也就是说，崇宁二年（1103）四月卅之后，经邦不可能见到程颐。所以，他入太学的时间，最晚不能晚

于崇宁二年（1103）四月。

第三，当时太学校规很严。太学生一年里的节假日，正旦节（即春节，相当于寒假）放假时间最长，从大年廿四（小年）开始，到正月十五（元宵节）止。此外，只有上巳节（三月三）放1天假，清明节放3天假。平时在校外过夜要登记，每个月最多允许4次在外住宿。陈经邦就读太学，后以上舍登进士第，必是严格遵守学校规章制度的。所以，他只能在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寒假期间，才能自开封赴洛阳问学，因而也只能在崇宁元年（1102）春季补入太学。

据陈均《九朝纲目编年备要》卷二六载：“（崇宁元年八月廿二），置外学，赐名辟雍。”辟雍为太学外学，以处太学外舍生。据此，崇宁元年（1102）秋，陈经邦转入辟雍读书。

有了入太学的时间认定，即可大致推算陈经正、陈经邦出生年份。北宋后期，平民子弟入太学的年龄规定是弱冠入学，即20岁入学；官宦（八品以下）子弟不受此年龄限制。陈经正于元符二年（1099）十二月底“随太学补试”，相当于元符三年（1100）春季补入太学，入学之年20岁，因此，其生年为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陈经邦于崇宁元年

（1102）春季补入太学，入学之年20岁，因此，其生年为宋神宗元丰六年（1083）。经正、经邦同为陈宗伟之孙，虽然经邦之父陈士珪（君玉）是经正之父陈士衡的兄长，但经正是陈士衡长子，经邦是陈士珪（君玉）次子，经正年长经邦2岁，因此，经正为堂兄，经邦为堂弟。

程门岁月与荐引人

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程颐建伊皋书院于洛阳鸣皋（在今河南省伊川县鸣皋镇），长期在此著书讲学。哲宗元符三年（1100）春，初入太学的陈经德（与经正同时入学），问学于时在汴京的程门温州籍学者许景衡。四月，程颐自峡州还洛。十月，复通直郎，权西京国子监。是年冬，经许景衡引荐，陈经正离开太学，西赴伊皋书院，入程门而习洛学。

陈经邦则于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底，随鲍若雨前往伊皋书院。弘治《温州府志·人物志》载：“有友数人俱从（鲍）若雨至洛，就程门受业，若瑞安谢佃字用休，潘旻字子文，平阳陈经邦……。”据此，崇宁元年（1102）腊月祭灶日，陈经

邦与太学瑞安籍同学谢佃、潘旻一起，利用正旦节假日，随温州籍同学鲍若雨赴洛问学，并于崇宁二年（1103）元宵节返京继续读书。

崇宁二年（1103）四月，程颐被党禁牵连。朝廷诏河南府“尽逐学徒”。程颐遂迁居洛阳龙门之南，并劝止各地求学者。五月，陈经正被迫离开洛阳，携经邦诸兄弟南归平阳，于是年秋回到乐溪，看望年迈体衰的老祖父（陈宗伟）。十月廿八，陈宗伟卒。

讲学生涯与会文阁真伪

崇宁三年（1104）十一月，陈经邦回到太学。大观三年（1109）正月廿三，试上舍生，陈经邦以上舍中等免省。三月廿一，陈经邦以上舍赐第，赐同进士出身，授官将仕郎。

而在陈经邦登第前1个月，大观三年（1109）二月初十，经邦之父陈士珪病故。五月，陈经邦还乡守制，时间3年（实为27个月）。

守制期间，经正、经邦的程门瑞安同学曾来南雁荡山讲学。陈玘《游南雁荡山记·旧志条记》有载：“（大观间），陈经邦、潘旻、许景衡辈会此（山庵）讲学。”据对许景衡生平事迹研究，约于大观四年

（1110），瑞安籍程门学者许景衡、谢佃、潘旻来到平阳，在陈经邦等陪同下，游览了南雁荡山东西洞及金鼎峰等景区，并在东洞（时称余公洞）石门庵讲学，留下了许景衡《游南雁荡》、谢佃《南雁月牖》、潘旻《南雁金鼎峰》3首诗。

政和元年（1111）六月，陈经邦守制期满，居家待次。大约在此时，陈经正、陈经邦在南雁东洞石门庵（或周边）建会文书院。“辟斋舍数楹，与诸弟朝夕讲贯其中”。康熙《平阳县志·人物志》因此记载：“（经邦）与兄经正同受学于二程先生，得其传以归，人奉为师。”

但在南雁荡山之外，慕贤东乡浦源却有会文阁（亦称会文书院）遗迹。何子祥《白沙里观海阁社学记》转述：“金生又云：‘宋儒陈经邦先生会文书院相去止数武，明时有白沙社学，方继学先生讲学其地。’”其出处或为康熙《平阳县志·人物志》所云：“（陈经邦）所居有会文阁，自为记。”

所谓陈经邦《会文阁记》云：“邦自髫髻读书，晚而不倦。……谋于家居之前，创为书阁，且欲远于家务，庶免家人之所讥议。……日与诸友登临于此，以读书缀文为事。休则凭阑寓目，畅气舒怀，一觞一咏，自

有余乐”。落款“时崇宁三年岁在甲申三月壬子也”。

清末吾浙硕儒吴承志直斥《会文阁记》为“伪托”。吴先生考曰：“《记》称‘髫髻读书，晚而不倦’，应是暮年之作，然末署‘崇宁三年（1104）岁在甲申三月壬子’，证之篇中所云，多不相合。经德行辈后于横塘（许景衡），是年横塘年止三十三，经邦度不过三十，何得遽以为晚？……（陈）宗伟没于前一年（崇宁二年）十月二十八日，下距是年三月朔，止百二十余日，经邦如何于忧服中欢然为乐，创构书阁，凿沼开圃于其间？（陈）君玉没于后五年（大观三年）二月，是时尚在，何云欲远于家务，免家人所讥议？检钱氏大昕《宋元辽金四史朔闰考》，是年（崇宁三年）三月甲戌朔月内并无壬子，知此文乃后人臆益，不然全文皆伪托也。”民国《平阳县志·古迹志》亦直接断言：“旧《志》云（会文阁）在浦源，今其地相传犹存遗址，盖后人因南雁山会文书院而附会为之。”

宦业沉浮与卒年推测

明·王朝佐《东嘉先哲录·陈迪功》引元大德《平阳县志》载：“陈

经邦，大观三年进士，终迪功郎。”大德州志修于元初，其载陈经邦“终迪功郎”必非虚言。

查北宋官制，迪功郎为宋徽宗政和六年之后的选人新阶第七阶。北宋前期，选人第七阶为判司簿尉。徽宗崇宁二年（1103），改判司簿尉为将仕郎。政和六年（1116）十一月，改将仕郎为迪功郎。因此，陈经邦授迪功郎应在政和六年十一月或之后。据此时间并依北宋新及第进士授官惯例推算，陈经邦宦业沉浮轨迹如下：政和三年（1113）冬，差遣某县尉；六年（1116）十一月，改授迪功郎，迁某县主簿。至于“终迪功郎”的原因，或为宣和二年（1120）十月，方腊起事，东南大乱，经邦因而弃官还乡，不再复出。

至于二陈先生卒年，目前无明确史料可资考证。但从杨时、许景衡、尹焞等程门学者在南宋初年备受推崇的情况来看，二陈先生卒年若晚于南宋高宗绍兴初年（1131），其生前必有宣召，身后亦必有史载。今观地方史志，即便温籍程门弟子谢佃、潘安固诸人，均亦稍有记述。因而可以推想，二陈先生当卒于北宋末年，未入南宋。

（作者系原平阳党史办公室主任）

旗杆内没白身人

——北港南湖黄家旗杆石的前世今生

◇ 陈盛奖

古时平阳县北港南湖地方有田一万余亩，三面是山，东面缺口，连鳌江，“形如卧壶”，中间是一个如西湖一样的大湖。只要三年不满水，没有水灾，当地就很丰稔，有句闽南话说：“猪母也可以戴耳子钩。”也就是说猪娘的耳朵也可以戴上金子做的耳坠，可见是非常富裕的。“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南湖人耕读传家，殷实人家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后，子弟就纷纷出门读书，求功名，“十八担书簏出南湖”。

以前南湖有两个地方叫“旗杆内”，一在今前街的黄家，一在今龙湖村上坎头的赵家，这两家门前都竖有高高的旗杆，大家称这两家所在地都会说是“旗杆内”，不过现在“旗杆内”名称更多说的是黄家所在地。南湖至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旗杆内没白身人。”是说黄、赵两家的

人是有身份的读书人，不是一般的平民百姓，他们两家是清代中后期南湖主要的书香门第。其实我国现在很多地方还有旗杆，即使旗杆没有了，还有用来夹旗杆的旗杆石，说明这些有旗杆石的家族在古代都是非常显赫的，都可以说是“旗杆内没白身人”。

20世纪70年代，上坎头赵家还有古屋三进，不过濒临坍塌。现在只能在上坎头村凤凰山麓处的赵家宗祠前看到高高竖着的旗杆，旗杆石有左右一对。赵氏宗祠始建于元代，系省文物保护单位。旗杆石被称为封建科举时代的“荣誉证书”，可以说是贵族的一种象征。古代家族中有人在科举考试中获得功名，贡生（也称“乡进士”）以上的，都可以在宅院或宗祠前，甚至在墓前，竖立旗杆，一个人一对，好事成双。若是进士出身的，

旗杆上半部做上两个四方斗，举人做一个四方斗，贡生没有斗。竖立旗杆，为了光耀门楣，同时可以作为后人学习榜样，这在清代非常盛行，目前全国很多地方的旗杆石基本上都是清代的。

南湖赵家历史上有功名的都是谁？据刘绍宽负责编纂的民国《平阳县志》卷三十《选举志三》载，赵家有三个贡生：赵步蟾，清道光甲申恩贡；赵莘，清光绪丙子恩贡；赵伟，清光绪甲申岁贡。贡生相当于举人，有资格参加京试，已经很不错了，刘绍宽也是贡生，是拔贡。那么黄家呢？据民国志和南湖《黄氏宗谱》载，在清代，黄家有举人，也有贡生。

在《黄氏宗谱》前面，有刘绍宽《赠修谱序》一文，开始就说：“黄为平阳钜族，南湖之黄尤为邑望。屏珊先生以名孝廉崛起其乡，诗书之泽，累世弗累，而其风俗朴茂，以孝义著闻乡里、光志乘者，又复不少。”屏珊就是举人黄步堂的号。谱中还收有刘氏撰写的《登赫公传》，登赫是黄步堂的侄子，榜名琬，号烜廷，他有三位胞弟：瓚、瑾、瑜。刘氏在光绪二十二年考上贡生，在家摆酒请客后，第二年春就到全县各地探



亲访友，主要访同宗，也到了南湖，他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二月初五的日记中写道：“晴。往南湖，至黄烜庭家。烜庭在郡未回，其弟松舟延午酌。午后至赵子琳家，邀晚酌。烜庭名黄琬，子琳名赵琬。”可见他先后到了同称旗杆内的黄、赵两家，联络感情。谱中还收有同乡赵步蟾、赵莘、水头街周喟、南雁坎头陈子蕃等各地名人学者的文章，无不对黄家人物推崇备至。

明末清初时,《黄氏宗谱》第五世黄辉宇,最早定居南湖。当地有户林姓人家的男人被老虎咬死,辉宇因为生活困难,就入赘林家,生子兴祥,姓林。林兴祥后来回黄家,重新姓黄,娶了一位“居富室,闻书香”的知书达礼的陈氏女子作妻子,管理内外,自己则攻书,“安心芸窗,不失为青衿儒者”,是庠生。据族内口口相传说,只有三代了才能去参加科举考试,当时兴祥就只好挂在林姓的名份下去考,所以他旗杆得竖在林家的墙外,今天新建的旗杆还竖在那里。估计那时庠生再捐些钱谷,升上一个级别,也可以竖旗杆。曾孙黄树兰、黄树畴在《兴祥公行实》中说他在黉宫(孔庙)县学里读书,“来瓯缙绅之盛”,是从他开始。而且他非常能干,善创业,广置田产,由森园卜迁新厅(就是现在黄家老屋旗杆内的地方),“建竖厦屋,以遗后人”。“厦屋”就是大屋的意思,是他开始兴建的,到后来这大屋拓展到三进半。

兴祥妻子贤慧,不但孝敬老人,相夫教子,而且在房子旁边另辟书房,昼夜督促孙子辈刻苦读书,求取功名,光宗耀祖。他们有三个儿子,后来分做三房。长子士铨(号耐

岩),乾隆丙子科岁贡;次子士镇(重岩),庠生;三子士钧(号和亭),乾隆戊子岁贡。孙子永字辈共八人,都读书,其中士钧子永濂(号霁轩),乾隆庚子恩贡。士钧墓在南湖底桐林(土贡)南边,前面有两对旗杆石,是他和儿子永濂的。第九世树字辈读书人更多,共有十七八人,看来单单黄家就有十八担书簏出门,他们中大都是庠生、儒士、国学生等,其中大房树畴系乾隆丁酉拔贡。

第十世二房黄步堂(1800—1858),字希明,号屏珊。是不羁之人,非常杰出。幼有神童之目,“胜衣就傅,便能诗能文”。道光庚子年(1840)出贡,咸丰辛亥(1851)恩科举人。曾掌教县城龙湖书院数年,任山长,“阖邑人士咸宗之”。晚年主讲乐清白象书屋,在乐清逝世,当地几十人素服送“归梓”到南湖。乾隆间县令何子祥在南湖兴修水利之后,因民居、种植等原因,湖身越来越逼窄,外泄之处如壶嘴,一遇山洪暴发,海潮涌入,四望汪洋,十几天都不退。为了保南湖丰收,他主持疏浚,三过家门而不入,之后二十多年平安无事,直到他侄子登赫再修水利。他撰有《例授明经芳园林公传》,非常详细叙写了林钟英的一

生，从中可窥见他的学识文才。“明经”是明清时对贡生的敬称，文中说林钟英“加捐贡元”，是“例授”，不是正式考出来的。

据二房后裔黄恢绪先生（其祖父靖侯留学日本同文书院）说，他们大家族旗杆内前面原有旗杆石二十四条，可夹旗杆十二支，共六对，分列左右，可见六个人有功名。综上所述，黄家共有五个人获得贡生以上的功名，其中黄步堂考中贡生后，可能竖了一对，11年后成举人，又建了一对上面有四方斗的旗杆。20世纪70年代文革期间，地方办李子加工厂，一下子就挖去二十二条，用来砌池子。后来挖出来，很多都断了，完整的只有十条，和原来的两条凑成了三对，刚好是原来的一半。无独有偶，昆阳镇坡南清举人诸葛钧门台外也有一对旗杆石，在那个年代也被水产部门挖

去另用，没有了下落。另外，位于前街的黄氏宗祠前也有一对旗杆石。南湖的旗杆石已不多了，都是文物，我们要存敬畏之心，好好保护。

民国18年（1929），平阳著名诗人陈梦麟到了南湖，写了一首《南湖怀古》诗：“四面云山拥小湖，湖光山色自成图。雨馀风定云都懒，地僻秋深草未枯。碧水祇今清浅在，画船依旧往来无。关心欲问群芳迹，应子昭文不可呼。”那时小湖还在，只是画船依旧没有，现在连小湖都没有了。如果有一天，有好事者向萧山造湘湖那样的精神学习，踵事增华，重新挖出一个南湖来，未必不是好事，到时候游人来，不仅仅是赏赏荷花而已。上面写了一些有关南湖黄家旗杆石的历史，也如诗人聊当“怀古”罢了。

〔作者单位：中共平阳县委党史研究室（县地方志研究室）〕

激烈的温州抗日巷战

◇ 王长明

温州为山水之城，城内“积谷、松台、华盖、海坦诸山犄据四角，河流绕贯”，城外“河流错综，茶山、吹台山、华亭山、戴宅尖诸峰雄峙环抱，综揽形势”。如此难得的美景，却曾经历过残酷的战争。抗战期间，中国



1941年5月，日本《支那事变画报》第95辑刊载温州城内作战照片

部队与日本侵略军在此展开过多次激烈的城市争夺、街巷攻防战斗。

日军画报与上海《申报》中的温州巷战

抗战期间，日军对温州大肆轰炸和骚扰掠夺，并先后三次侵占温州。

1941年4月，日军首次侵占温州。当年出版的日本画报曾刊发一张日军在温州城内作战的照片，上海《申报》也于同年4月21日报道：“在瑞安

及半浦登岸日军，于十九日下午在温州城内展开激烈巷战。”

当日下午至晚间，在中日双方鏖战于莲花心等地的同时，日军开始向温州城区发起攻击。中国守军暂编第三十三师第三团第一营，会同警察大队顽强抗击。次日拂晓，日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集中兵力攻城，并于11时向东、南、西三面围攻。守城部队全力反击，但苦于敌机低空袭击，活动困难，城区被敌突入。第一营的战士们与日军展开巷战，相持至

13时。后因实力悬殊，无奈渡瓯江北撤，温州城区不幸陷落。

对此，中共温州独立支部成员孙道济之子孙牧青先生（时年十岁、家住蝉街）回忆：1941年，日军入城时他未及逃出，曾亲耳听见松台山、四顾桥两处先后枪声大作，事后还听大人说，没有来得及撤走的中国伤兵被日军用铁丝穿过锁骨在地上拖行。

突进西门街 攻入大南门 激战南北大街

1944年9月9日，日军第三次侵占温州。中国各部队于次日赶到温州城郊，于11日起发起反攻温州的战斗。

暂编三十三师第一团于11日下午占领仁王山（东屿山），12日凌晨1时攻至大南门，15时，该部约一营兵力攻入大南门内，成为首先入城部队。巷战中，日军伤亡惨重。第一团占领积谷山后，主力攻击华盖山。13日，拂晓稍过，第一团后续主力进入大南门，与日军发生激烈的巷战。14日，第一团主力仍在城内激战，中午在城内南北大街（今解放街）以设施阻塞切断日军联络，并调整阵线准备继续作战。

与此同时，新编第二十一师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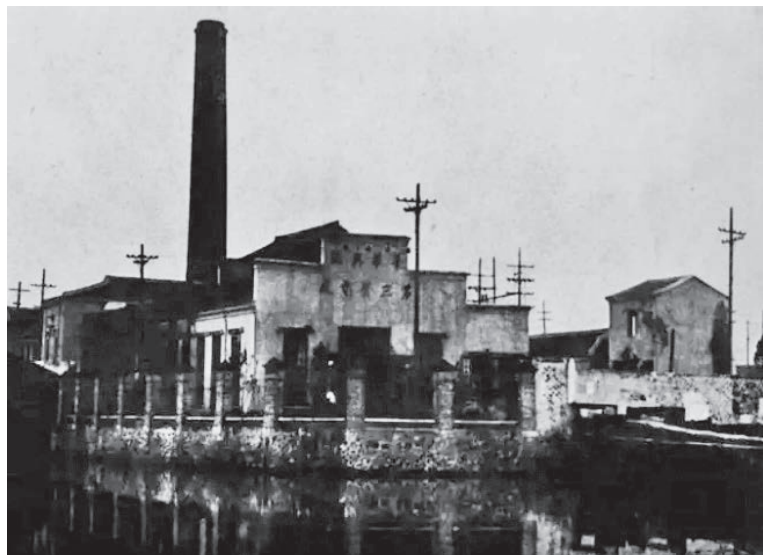


蝉街旧影，远处松台山顶建有抗战纪念碑

命从西面先占领城外要点（莲花心、双坟山、翠微山），再从西门攻入城内。13日，该师攻占双坟山后，于10时进迫西门，一部突入西门街，与据守翠微山的日军发生激战。至15日，西门日军凭借工事顽抗，直到晚间中方仍继续猛烈冲杀。

二进小南门 喋血双莲桥

第三突击队从11日至15日两度攻



普华发电厂旧影

入小南门一带，占领普华发电厂（旧址在今鹿城供电公司）、双莲桥、永宁桥（今称小南门桥）等地。1944年12月《突击队》月刊发表战地通讯《丽温战役散记》，详细介绍了此次战斗经过。第三突击队从丽水南下追击日军，连续作战。部队抵达温州，未作休整，就投入攻城作战。突击部队一进小南门，就展开周密部署，行动秘密，直到进抵小南门附近时，日军才有所觉察。

第二次进攻小南门要更顺手一些。城南两千四五百公尺的平原，尽是一些青禾水田，池沼纵横，花费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架便桥、电线，并未遭受日军防御力量的抵抗。但一到小

南门门口，日军的炮火像倾盆大雨似地集中于小南门，但突击战士毫不畏惧，前赴后继，先后攻占双莲桥、永宁桥。

堵塞街道，构筑据点，选派敢死队员，成了突

击队此时的中心工作。但因城中华盖山与城外莲花心尚未攻克，城内部队受到压制，所处态势极为不利，故将第三突击队抽出，与新编二十一师合攻莲花心。至30日全线总攻时，中国军队未能再次攻入城中。

“一寸河山一寸血”

对于1944年的温州巷战，据目击者黄肇金老人回忆：当时中日两军在府前街激烈交火，同时大南门外今瑞祥大厦、鸿瑛大厦、万里桥大厦等地段一片火海（见中共温州市鹿城区委党史研究室编《日军入侵鹿城暴行纪实》）。徐定水先生在《温州三次沦

姓 名	籍 贯	职 别	阵亡时 年 龄	阵亡时间	阵亡地点
李加泉	平阳钱库	二等兵	25	19440912	永嘉小南门
李家合	平阳灵峰	一等兵	24	19440912	永嘉小南门
白希取	平阳腾蛟	二等兵	25	19440912	永嘉小南门
陈美教	平阳水头	一等兵	25	19440912	永嘉小南门
宋国栋	平阳鸣山	一等兵	25	19440915	永嘉双莲桥
倪裕奎	平阳练川	一等兵	25	19440915	永嘉双莲桥
黄忠姜	平阳大观	一等兵	25	19440915	永嘉双莲桥
施臣级	平阳青街	二等兵	不详	不详	永嘉双莲桥
郑孟段	平阳钱库	一等兵	25	19440912	永嘉双莲桥

殉国于小南门、双莲桥的9位平阳籍烈士

陷期间工商经济之损失》中记述：中日两军曾在虞师里一带作战，有黄源利、宝华、大陆义记等纱线织衫商店遭炮火焚毁，损失达8000万元。

逐街逐巷的争夺，势必带来惨重伤亡。据《丽温战役兵站补给概况》记载：战役进展至永嘉附近后，因战况惨烈，伤患激增，医疗救护力量已难以应付。《中华民国忠烈将士姓名录》《平阳县出征抗敌阵亡员兵名录》收录了1944年于永嘉（温州）小南门、双莲桥殉国的9位平阳籍第三突击队士兵英名。由于诸多原因，八成以上的抗战烈士成为无名烈士。照此推算，单是战死小南门、双莲桥的中

国军人就可能有60余位，在温州城区各处抗日作战中殉国的英烈当有数百人之多。

抗战全面爆发一周年之际，平阳籍著名学者苏渊雷曾写诗云：“莫道芦沟桥是坟，中原到处有英魂，直须死里求生地，寸寸山河染血痕”。正所谓：“一寸河山一寸血”，“死中求生，亡中求存”，伟大的抗战精神，请以温州验之！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研究成果，文中所涉内容供读者参考交流）

（作者系市政协委员、市网联会副会长、温州新闻网舆情部副总监）

生而为英，死而为灵

——刘英传略

刘英，原名刘声沐，化名可夫、爱群、越人、王志远，江西瑞金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政治部主任，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政委，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书记，中共浙江省委书记，中共中央华中局委员、特派员等职。1942年5月被国民党当局秘密杀害于浙江永康方岩。

刘英，1905年11月26日出生于江西瑞金县象湖镇竹岗村一个农民家庭。1922年7月，瑞金县私立群德高等小学毕业。后在家务农。

1924年，刘英到松山小学（原群德小学）任教，大大地开阔了眼界。他除了看到闽西出的《岩声报》外，还看到了《新青年》《向导》和《改造月刊》等进步刊物，受到了新思想的影响。1927年，刘英离开了松山小学。不久，他同两个青年合伙，借资在瑞金城开了个小米店，想借此糊

口。但经营年余，米店亏损关门。其时，他结识了以行医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的中共瑞金县地下组织负

责人之一的邓生文。刘英经常听邓生文讲述革命道理，觉悟不断提高，并协助邓生文做一些革命工作。

1929年4月1日，毛泽东、朱德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从福建长汀进驻瑞金城。刘英当天正在地里干活，听到这个消息后，连家都没有回，将手中的农具往田头一丢，就一路小跑到了瑞金县城报名参加红军^①。参军后，他将自己的名字刘声沐改为刘英，还写了一首诗，表达自己献身革命的决心：“幼时不知路，今日上坦途。赤心献革命，决然无反顾。”



刘英参加红四军后，先在军部担任会计，不久后担任军供给部出纳股股长。9月，他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毛泽东看他文笔不错，把他调到军部负责文书工作。在毛泽东、朱德等人的亲切教诲下，刘英成长很快，先后担任过红军的连指导员、营政委、团政治部主任和团政委。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刘英被调到新成立的红五军团任第十五军四十四师政委（该军后编入红一军团）。

1932年4月，刘英跟随毛泽东率领的东路军东征漳州。其间，他在毛泽东的直接指导下，受到了一次全面的锻炼，并对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和策略思想有了深刻的认识，工作能力有了很大提高。1933年11月，刘英被调到红九军团担任三师政委。不久调任红五军团十四师政委。不久，他又被调到红七军团，担任军团政治部主任。

1934年7月初，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冲破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围剿”，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由红七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立即向闽浙赣皖等省出动，宣传党的革命主张，开展广泛的抗日活动。刘英被任命为北上抗日先遣队政治部主任。

7月6日晚，红七军团6000多人从

江西瑞金出发，开始执行北上抗日的任务。刘英和参谋长粟裕等协助军团长寻淮洲转战于闽东、闽北和浙西南地区，并一度攻入江山县城。11月4日，北上抗日先遣队接到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命令，将红七军团和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及新升级的地方武装合编，成立新的红十军团，以组成更强有力的北上抗日先遣队。红十军团下辖第十九、二十两个师（12月整编为第十九、二十、二十一师3个师），对外仍称北上抗日先遣队。原红七军团改编为第十九师，刘英被任命为红十军团政治部主任，兼任十九师政治部主任，并随十九师行动（由于战事关系，此时两个部队尚未会合整编）。

11月18日，十九师离开重溪向皖南进军，沿途捷报频传。12月10日，方志敏率领第二十、二十一师到达安徽歙县的汤口地区，在此与奉命南返的第十九师会合。为统一领导红十军团和创造新苏区，他们根据苏区中央分局的命令，决定组成以方志敏为主席的五人军政委员会，作为先遣队行动区域内党政军的最高领导机关，刘英为五人军政委员会成员之一。

12月14日上午，军队在谭家桥附近战斗失利，被迫北移。刘英在组织

部队撤退的战斗中，右手腕被子弹打穿，右手小拇指被打断一截。谭家桥战斗的失利，使军队陷入极其被动的局面，部队只得返回闽浙赣苏区进行休整，再图北上。

1935年1月，北上抗日先遣队主力2000多人在江西怀玉山区陷入重围。鉴于敌情紧急，方志敏命令刘英、粟裕带部队先走。刘英和粟裕立即率领先头部队，于当晚机智地越过了敌人的封锁线，安全到达闽浙赣苏区，并很快和闽浙赣省委取得了联系，而先遣队大部分指战员英勇牺牲。

根据中央指示，苏区中央分局命闽浙赣省委立即以先遣队突围的部队为基础，组成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深入浙江开展游击战争，吸引和打击敌人，策应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配合友军行动，保卫闽浙赣苏区；在浙江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新的苏维埃革命根据地。1935年2月，挺进师正式组建，共有538人，编为3个支队和1个师直属队，由粟裕任师长、刘英任政委。

在组建挺进师的时候，刘英和粟裕等领导人认真分析了浙江的地理位置、地形与群众基础，选定以仙霞岭为中心的浙西南地区作为创建游击根据地的第一个目标。3月初，刘英、粟

裕率领挺进师到达闽北苏区的崇安县坑口和车盆坑，进行了半个月的政治军事训练。鉴于挺进师将单独深入到白区与敌人长期作战，他们决定成立挺进师政治委员会，以作为挺进师行动区域内最高的党政军领导机关。政委会由刘英、粟裕等9人组成，刘英为书记。同时，将原有3个支队扩编为3个纵队。3月下旬，挺进师进入浙西南。由于浙西南是一个重要战略地区，驻有较强的敌保安团，为了进入该地区，必须先在外围活动，把敌人引出来，给以各个打击。为此，在开始时，刘英和粟裕率部在浙闽边境进进出出，往返作战，兜了几个圈子，先后打了大小几十仗，歼灭了一批保安团和地主武装，弄得敌人十分惶恐，急派大军阻击。

4月21日晚，挺进师在福建寿宁上村遭到闽保二团的袭击，牺牲一名连长和十几名战士，丢失电话机、电话线等全部通信器材，从此挺进师和党中央及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刘英和粟裕总结了上村战斗失利的教训，把没有子弹的重机枪和一些有碍于开展游击战的辎重统统埋掉，战士一律实行轻装，并以电话兵为基础增编了第四纵队，从而使挺进师迅速地实现了从正规战向游击战的转变，成为一支

灵活机动的游击部队。

4月下旬，挺进师在庆元的斋郎地区，以500余人的兵力，英勇抗击浙闽两省保安团和地主武装3000余人的分进合击，杀伤敌军300余人，俘虏约200人。斋郎战斗，是挺进师进入浙江后的第一个大胜仗，也是关键性的一仗。这一战斗的胜利，迫使龙泉河以南之敌转攻为守，龙泉河以北则因兵力南调比较空虚，从而为开辟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1935年5月上旬，刘英主持召开挺进师政委会会议，决定开创以仙霞岭为中心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并成立了中共浙西南特委。他还和粟裕一起，热情地团结教育当地“青帮”组织首领陈凤山、卢子敬等领导的农民群众，发展陈凤山、卢子敬等先进分子入党，使来自外地的挺进师部队很快就与当地的革命力量密切结合起来，有了初步的依托。7月底，挺进师在浙西南建立了第一个区苏维埃政权——松阳县玉岩区苏维埃；8月初，中共遂昌王村口区委和区苏维埃成立；稍后，龙泉住溪区苏维埃成立。这样，以仙霞岭为中心、纵横百余公里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建立了。同时，挺进师也由500余人发展到近千人。这些胜利，标志着挺进师已在

浙西南站住了脚，初步完成了党中央布置的开辟新的浙江游击根据地的任务。对此，蒋介石急急忙忙任命卫立煌、罗卓英为“闽赣浙皖边区清剿总指挥部”的正副总指挥，动用40个团的兵力，开始对浙西南根据地进行第一次大“围剿”，妄图围歼挺进师，彻底摧垮浙西南游击根据地。

9月下旬，刘英、粟裕率部向龙泉上田之敌猛攻，打死打伤敌军百余人，缴获一批武器弹药，并得知这是以敌中央军为主的大规模“围剿”。鉴于敌我力量悬殊，刘英和粟裕决定采用游击战的战略战术来打破敌人的“围剿”。同时，师政委会根据刘英的提议，除留下一部分部队就地坚持斗争外，主力部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到闽浙边境活动，以积极行动吸引敌人、调动敌人，并开辟和建立新的根据地。

10月5日，挺进师主力和中共闽东特委书记叶飞领导的闽东红军独立师胜利会师。由于双方都和上级及中央失去了联系，所以这次会师对双方都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在联席会议上，大家都认为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共同的领导机构来统一部署浙闽边的工作，在战略上互相协调、互相策应，以增强反“围剿”的力量。双方协商

后，于1935年11月成立了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刘英任书记，粟裕任组织部长，叶飞任宣传部长兼少共临时省委书记。同时，成立了闽浙边临时省军区，粟裕任司令员，刘英任政治委员。

面对敌人企图集中力量摧残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反革命策略，闽浙边临时省委决定立即着手开辟新的游击根据地，以分散牵制敌人。除令北渡瓯江的第一纵队加紧向浙东地区（即括苍山南北地区）发展外，重点放在开辟浙南地区的游击根据地。局面打开后，刘英带少数武装和临时省委机关在瑞（安）平（阳）泰（顺）地区开展游击根据地的创建工作；粟裕则率领武装部队在浙闽边进进出出，吸引和打击敌人，以掩护临时省委开展工作，并支援浙西南地区的斗争。刘英率领临时省委机关和武装人员，在福鼎、泰顺、平阳一带活动，发动群众，建立各县、区党组织。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福鼎、泰顺、平阳以及瑞安一带党的组织普遍建立起来，群众也普遍发动起来，革命声势日益扩大。

但是，当敌人知道红军主力不在浙南基本地区后，平阳、泰顺等县的敌军就经常以连、排甚至以班为单位

出来骚扰，气焰十分嚣张。为了保护群众的利益和革命热情，刘英决定给敌人以严厉的打击和惩罚。1936年2月7日，国民党浙保第十大队第三中队进攻临时省委驻地泰顺白柯湾。刘英亲自指挥反击，不到半小时战斗就结束。挺进师在泰顺打出了威风，为建立浙南游击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1936年6月，两广事变^②发生，国民党的主力部队调离浙江，形势十分有利。8月，为进一步开展浙江的游击战争，刘英在福鼎县李家山主持召开临时省委扩大会议，宣布浙南人民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其间，刘英、粟裕率部队在李家山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全歼浙保五团一个连，生俘敌连长以下60多人，缴获了许多枪支弹药。战斗结束后，刘英用刺刀在李家山村中的两棵红枫上刻下了“打破旧世界、建立苏维埃”两行大字。刻完之后，刘英意味深长地说：“等这两棵树上的字长合的时候，也就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时候。”围观的战士和群众听了都报以热烈的掌声。

李家山战斗后，刘英、粟裕率挺进师频繁活动于浙江和福建交界的福鼎和泰顺一带，进行分青苗和开展抗租、抗债、抗捐、抗税运动。9月，红军挺进师在瑞（安）平（阳）交界与

浙南地下党负责人叶廷鹏等领导的一支革命队伍会师，使浙南游击根据地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并恢复了与党中央的联系。

在建立和巩固浙南游击根据地的过程中，刘英每到一地，总是深入群众做思想发动和组织工作。他经常召集群众开座谈会，一方面宣传党的政策，另一方面开展社会调查。浙南地区和福建的福鼎县通行的是温州话和闽南话，非常难懂。挺进师最初到这一地区时，语言不通，只能靠打手势来交流。为了方便工作，刘英专门调了两个既会讲普通话又会讲当地方言的同志在身边做翻译，并向他们学习本地话。后来，他不仅能听懂群众的方言，而且还可以用方言做群众工作或进行一般性的交谈。由于掌握了方言，他和群众接触的机会多了，浙南一带的群众也都喜欢和他交谈，亲切地称呼他“可夫同志”。刘英还特别重视对当地干部的培养和团结，在坚持闽浙边斗争的3年时间里，培养和提拔了一大批当地干部，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深受群众拥护和爱戴的群众领袖。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采取了“北和南剿”的反动方针，命令刘建绪部和浙闽两省国

民党当局立即向闽浙边区发动进攻。次年2月初，刘英、粟裕指挥部队击溃浙保和国民党军第八十师约3000人向泰顺峰文的进犯后，为了避开敌人的合围，以及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临时省委和军区经过研究，决定在军事上改变原来把主力留在浙南狭小根据地里作战的办法，采取化整为零的方针，转到敌人的侧翼和后方，或者敌人不注意的地区分散打游击。同时，决定刘英率临时省委机关和教导团的短枪队，从瑞（安）泰（顺）边基本地区向东北方向转到敌人左侧活动，粟裕带领挺进师主力部队回浙西南地区活动。此时，敌人的主要注意力放在山区。刘英趁机大胆地率部向敌人的腹地推进，把游击战争从山地转移到了平原。

正当浙南游击根据地军民紧张地投入反“清剿”斗争之际，3月，闽浙边临时省委政治交通员吴毓从上海回到温州，带来了中共驻沪办事处转交给刘英的电文。电文的内容是同年2月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五项要求，四项保证”。由于国民党军的严密封锁，吴毓无法与刘英取得联系，就与临时省委派驻温州城区的白区工作团商定，以临时省委和临时省军区司令部的名义，发布了《停

止内战，一致抗日致国民党闽浙赣皖边区主任公署和闽浙两省当局的快邮代电》，提议双方迅速派出代表举行和平谈判。5月初，得到了国民党浙江地方当局表示愿意“面洽”的启事，双方商定先停战一周，以便红军商派正式代表举行和谈。这样，吴毓、黄先河借停战之机，得以通过封锁线进入平阳北港山区向刘英汇报。临时省委决定由吴毓、陈铁君等人为谈判代表，于5月中旬先后在平阳鳌江和温州城区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谈判破裂后，闽浙边临时省委发表了《为团结御侮、共赴国难以及和平谈判破裂告各界人士书》和《呼吁各界人士要求闽浙两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宣言》。同时还把谈判破裂情况向党中央写了报告，经上海中共办事处转报延安。5月间，党中央十分关心南方红军游击队的命运，请贺龙写了一封信给国民党四省边区主任公署主任刘建绪，劝告他停止内战，和红军携手抗日，不要再做无益于民族的事情。1937年七七事变后，刘建绪为形势所迫，释放了在战斗中受伤的被俘、曾参加第一次谈判的陈铁君，并写了一封给刘英、关英（闽浙赣省委书记）和黄道（闽北特委书记）的信，交给陈铁君带回，表示愿意同红军通过谈

判实现合作抗日。

8月24日，双方代表在温州城区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但四省边区主任公署没有及时将和谈的结果通令闽浙边各县的国民党军政当局，致使红军行动发生困难，一时无法集中。9月16日，刘英在平阳县山门街西山，亲自与刘建绪派来的代表进行会谈。17日，双方将原协议第一条中“按照国军的编制”改为“根据任务编制”。同时还对原协议的其他条款进行了修改补充，修改后为：闽浙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并根据任务编制；红军集中地点在平阳县的北港区；红军军需与给养根据任务发给补充；集中时间自9月17日起至10月1日止；无条件释放政治犯；一切政治问题，由双方中央解决；目前宣传工作根据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原则进行。

而后，刘英派吴毓、龙跃两人到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汇报浙江国共两党谈判的经过和结果，并请示今后的行动方针。吴毓、龙跃两人走后，刘英将分散在瑞安、平阳、泰顺、青田、丽水、永嘉等县的200余人全部集中在平阳北港，然后分别派人往浙东南、浙西南及金衢方向寻找仍在坚持游击战争的粟裕、谢文清等人。9月底，刘英又派陈铁君、苏斗正、余龙

贵寻找闽北的黄道和赣东北的关英，向他们通报同国民党当局谈判的情况。10月，粟裕、谢文清等先后带领部队回到了平阳北港。

就这样，以刘英为首的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和红军挺进师，在和党中央重新取得联系并获得了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有关决议、文件后，比较迅速、自觉地根据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方针，结合浙江的具体情况，实现了从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战略转变，从而在浙江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部队在平阳北港集中后，改番号为国民革命军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此时，临时省委一方面着手部队的整训工作，另一方面以极大的精力创办干部训练班和抗日救亡干部学校，以适应新的斗争形势需要。刘英亲自在干部训练班讲述党的建设的理论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他还经常到抗日救亡干部学校作报告，给学生们讲抗日的形势，讲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并为该校书写了“团聚与组织千百万的民众一致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题词。

1938年2月间，刘英派龙跃、余龙贵到南昌新四军办事处汇报浙江党政军情况，并请办事处派人来浙江研

究红军部队编制问题。3月初，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曾山由龙跃、余龙贵陪同，从南昌到温州，向刘英等传达了长江局和东南分局的有关指示，决定将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编入新四军，由粟裕和陈铁君率领开赴皖南；刘英继续留在浙江坚持斗争。

5月7日，刘英随曾山到南昌向东南分局请示工作后返回平阳，主持召开了中共第一次浙江临时省委会议，宣布撤销闽浙边临时省委，成立中共浙江临时省委，他就任临时省委书记。5月12日，浙江临时省委机关秘密迁入温州城。刘英大多数时间住在温州城里，利用温州的地下交通站和新四军驻温州通讯处与全省各地党组织保持联系。9月，经党中央批准，临时省委转为正式省委，刘英仍任书记。

10月10日，新四军驻温通讯处被破坏，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长谢文清和省委常委、青年部长赖大超等人被捕。事件发生后，刘英立即派通讯处主任周饮冰到国民党温台戒严司令部交涉，结果周饮冰也遭到逮捕。刘英又派新四军驻丽水办事处主任吴毓前往交涉。国民党当局借口搜获党内文件，拒不放人。

1939年1月，在刘英的主持下，省

委在金华召开会议。会议讨论了关于建立中共浙西特委、开辟浙西工作的问题，并根据刘英的意见，调顾玉良前往组织浙西特委，担任特委书记。会议分析了浙西的复杂情况，认为在抗日前线和沦陷区，如果没有革命武装力量，是不易开展工作的。因此，提醒浙西特委必须注意武装工作，建立一支强有力的抗日武装，打开浙西游击根据地的局面。

由于国民党到处搞摩擦，形势恶化，温州的环境也一天比一天恶劣，省委决定从温州搬到丽水。1939年3月，刘英率省委机关到丽水后，住在城外的夏河村，化名王志远，以“兴华百货商店”老板的身份为掩护，出入于省委各个交通点，领导全省工作。3月下旬，刘英接到曾山的来信，说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将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公开身份到浙江视察工作。刘英化装成商人先期到了金华，等周恩来来到金华后，向周恩来汇报了浙江的工作情况，并听取了周恩来对浙江工作的重要指示。

此时，浙江党的工作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打开了一个很好的局面，全省已有55个县建立了党的县委或工委，党员已达两万多人。在这种形势

下，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时机已经成熟。

1939年7月21日至30日，在刘英的主持下，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平阳凤卧的冠尖和马头岗举行。刘英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和两年来浙江工作的书面总结。在政治报告中，他分析了浙江的政治形势，提出浙江全党和全省人民的紧急任务：加紧全民动员，加紧统一战线工作，提高民族意识与战斗意识，反对妥协投降企图，推进民主政治，组织广大工农青年、妇女，发展民众团体，扩大民众运动，以积极参加各种抗战工作。大会选举了新的省委，刘英任省委书记兼统战部长。大会还选出了出席党的七大的代表，刘英为代表团团长。

10月17日，刘英率领浙江代表团从丽水出发去东南局集中参加党的七大，10月底到达皖南新四军军部。当时东南局也设在这里。刘英就坚持浙闽边三年游击战争和浙江的抗日斗争情况向东南局负责人项英作了详细汇报。项英希望他写一个书面材料。于是，刘英利用在皖南停留等待其他省代表团到来的这段时间，开始《北上抗日与坚持浙闽边三年斗争的回忆》一文的写作。

代表团在皖南住了不久，接到中

央的电报，大意是：时局发生逆转，浙江的主要领导干部不能离开浙江，要坚持在浙江斗争，并指明刘英要留在浙江。于是，刘英在征得东南局同意后，带领代表团中的3位特委书记返回浙江。

12月16日，刘英等回到丽水后，立即向参加省委宣传工作会议的代表传达了上级指示，指出国民党正在搞摩擦，我们要进行反摩擦、反分裂的斗争，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向代表们传达了党中央在纪念抗战两周年宣言中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政治口号。在与会代表离开前夕，刘英还亲起草了一份文件，让他们带回去传达。由于形势的变化，根据中央的有关指示，刘英对全省工作重新作了部署，提出了巩固发展党的组织、加强对党员秘密工作的教育、提高警惕、严防奸细混入党内等5项紧急任务。为了保存力量，他还将在国民党政府各部门工作、身份已经暴露的共产党员陆续调离转往新四军，同时抽调一批愿意转入秘密工作的同志充实各级领导机关。

刘英在丽水主持省委日常工作的同时，继续撰写他在皖南尚未完成的

《北上抗日与坚持浙闽边三年斗争的回忆》一文，直到1940年夏他第二次到皖南，经慎重修改后才脱稿。这篇回忆，对于了解和研究北上抗日先遣队和浙闽边三年游击战争是一份重要的历史资料。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形势进一步恶化，省委于4月初搬回温州。刘英准备按照东南局的指示，在平阳、瑞安交界的地方办一个训练班，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以适应新的斗争形势的需要，结果因连遭国民党顽固派两次袭击而未能实现。

5月，中共中央决定将东南局与中原局合并成立华中局，同时任命刘英为华中局委员。7月，中央任命刘英为华中局特派员，负责指挥浙江、福建、江西三地区工作。同年秋，中共中央华中局政治交通员涂峰来到温州，传达了刘少奇同志关于白区工作的指示、党中央关于重建新四军的命令以及中央关于刘英的任免决定。刘英在温州向各特委传达了中央的指示。

1942年初，国民党到处侦搜中共浙江省委和浙南特委机关。刘英认为省委如果继续设在城里很危险，决定在春节后将省委搬到闽浙赣三省边境的福建浦城，并写信通知有关同志到温州布置工作。不料就在这时，叛徒

李少金供出了省委的有关情况。2月初，国民党浙江中统室派遣特务率叛徒李少金等人到温州实施抓捕行动。2月8日晚，刘英在省委秘密联络点恒丰盐店被捕。接着，省委机关的工作人员和交通联络员相继被捕。省委秘书周义群当即叛变，并带领敌人搜捕省委工作人员。浙江省委机关遭到严重破坏。

刘英被捕后，当即被扣上了脚镣，被关进永嘉县看守所。国民党八区（即温州市）行政督察专员张宝琛得意地说：捉获刘英一人，胜俘敌十万。张宝琛还到看守所去“看望”刘英，并给刘英送去请帖，但遭到刘英的严正拒绝。国民党温台防守司令萧冀勉也到看守所“探视”。他们妄图劝降刘英，但都碰了钉子。刘英虽然身陷囹圄，但还关心着自己的同志。当获知省委秘书顾春林被捕时遭到枪击受伤的消息后，他立即要求萧冀勉、张宝琛给予医治。经交涉，他在看守长的“陪同”下，拖着沉重的铁镣，特地去看望顾春林，进行了亲切的慰问和勉励。刘英在永嘉看守所关押了近两个星期，敌人原想借此机会破获全省党的组织，但阴谋落空后，决定将他从温州押解到国民党浙江省政府所在地永康方岩。2月底，

刘英被押解到永康方岩后，敌人几乎每隔一日就对他进行一次审讯，但刘英始终意志坚定，保持共产党员的气节。每次审问时，他总是那句话：“我的情况均在档案中，再没有什么东西可说了。”

刘英在方岩被关押了两个多月，国民党浙江中统室没有从他那里得到任何东西。最后，只得将刘英的籍贯、年龄、出身、职务、文化程度等作为审讯笔录，连同他的照片呈报给三战区司令顾祝同算了事。5月17日，蒋介石自重庆发来急电，飭速处决刘英。

18日清晨，天下着小雨。特务陈家璧等人来到关押刘英的地方，谎称日本人打来了要撤退，让刘英跟他们走。刘英看见进来了一批荷枪实弹的特务和刑警队员，知道敌人要对他下毒手了，便镇定地对陈家璧说：“把话说明白一点，不必遮遮掩掩，我自从被捕的那天起就做好了这种准备。”特务们押着刘英到了方岩汽车站后面的山坡上。刘英从容地转过身来，挺起胸膛向刽子手们投去了睥睨的目光。敌人害怕刘英呼喊口号，慌忙向刘英射击。

刘英烈士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中华民族的独

立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为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自己的一切。他永远是每一个共产党员和革命者学习的光辉榜样！

注释：

①另有一说是刘英于1929年3月底与青年刘德连一起到福建长汀参加

红军。

②两广事变，又称“六一事变”，是民国25年（1936）广东实力派陈济棠，广西实力派李宗仁、白崇禧等为反对蒋介石吞并地方势力而发动的一次事变。

（文章来源：《浙南百名英烈传》）

公益广告



粉身碎骨向光明

——李得钊传略

李得钊，又名德昭，字伯明，化名林志明，浙江永嘉人。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5年赴苏联学习，1927年离苏回国后，曾先后任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编辑、中央军委秘书处工作人员、中共上海中央局秘书处秘书长等职。1936年9月，牺牲于南京中央军人监狱。

李得钊，1906年出生于浙江永嘉县港头（今岩头镇李宅村），父亲李立勋是农村鞋匠。李得钊6岁时，母亲在贫病中不幸去世。叔父因生活贫困，终身未娶。父亲和叔父终日辛劳，共同抚养他，三口之家还难得温饱。由于营养不足，李得钊骨瘦如柴，但天资聪颖、记性极好。艰苦的生活磨炼，使他从小就很懂事，尊敬长辈。邻里称赞他，并力劝其父亲让他入塾从师。私塾先生体谅他家境贫寒，愿意免去学费。李得钊从屋角里

找到一块祖上用过的肉砧板，擦洗干净，让叔父帮他钉上4根木棒当脚，这就是少年李得钊的课桌。富

家子弟讥笑他，他却对同学说：“我不同他们比桌凳衣着，我们是来读书的！”

1916年，李得钊考入永嘉县立岩头高等小学。在校期间，他和金贯真等同学一起，受到谢文锦进步思想的熏陶。谢文锦兼授英语课，李得钊的英语成绩尤为突出。1919年，李得钊以优异成绩进入温州艺文中学。艺文中学是英国人办的一所教会学校，学校里有不少教规，如三餐前的祈祷、平时的圣经课程、星期日的礼拜等。李得钊只是表面应付，思想上并不信



那一套。实际上他在校时就曾写文章揭露过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略中国的罪行。

李得钊在校学习勤奋，为了提高英语表达能力，常同英语教师、英人亲属用英语对话。有一次他同英籍校长蔡博敏幼女隔栅交谈的事被蔡博敏知道后，竟被打了一巴掌。李得钊十分激愤，更加看透了这些洋老爷的伪善面目。

李得钊经常阅读进步书刊，还和金贯真等一起组织溪山学友会等进步学生团体。他们在寒暑假里组织宣传队，到楠溪山乡进行宣传演出，宣传新文化与进步思想，揭露军阀政府和帝国主义的罪行。通过这些活动，李得钊既教育了群众，又锻炼了自己。

那时候，政府腐败，军阀混战，列强入侵，民不聊生，李得钊就学于教会学校，感受尤深。他为此写了许多谴责黑暗邪恶势力、追求真理、歌颂光明的诗文，例如：

灯蛾

灯蛾扑火似无成，是是非非评不清，
我说灯蛾死可贵，粉身碎骨向光明。

萤火虫

莫道流萤小小虫，抗暴大胆称英雄，
风风雨雨无所惧，长发此光黑暗中。

字里行间，抒发了为真理奋斗、为光明献身的宏伟志向。

1923年，李得钊中学毕业后，受聘在岩头高小任教。1924年，李得钊为生活所迫，受聘担任艺文中学助教。是年秋天，谢文锦从上海回到家乡，筹建党团组织。在谢文锦建党的同时，李得钊同金贯真等8人，被介绍加入“S.Y”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①。

谢文锦在介绍他加入“S.Y”时给中央的报告里写道：“人极诚恳可靠，他现在虽仍在教会学校任事，但很有觉悟，教中曾屡次要保送他到南京神学院里去读书，而他拒绝之。不过他现在为经济所逼，势不能不暂在彼混饭吃耳……”

1925年5月，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并迅速向全国蔓延。在中共的号召下，全国发起了罢工、罢课、罢市的“三罢”斗争，相继有50万工人罢工、5万多学生罢课、2万家商铺20万店员罢市。温州人民在中共温州独立支部的领导下，成立了五卅惨案后援会，支持上海人民的“三罢”斗争。艺文中学的学生和教职员也毫无惧色地加入了斗争，李得钊在艺文中学声援上海工人的示威行动中负责宣传工作，并积极参与到温州独立支部领导

的革命运动之中。6月，李得钊因带头组织艺文中学师生参加罢教罢课、声援上海工人的游行示威活动，被校方辞退。

7月，在谢文锦的资助下，李得钊和金贯真一起离温赴沪，进入上海大学学习。上海大学是党早期培养革命干部的一所大学，许多著名的共产党人如瞿秋白、恽代英、邓中夏等，曾先后在这里讲学。李得钊离开教会学校进入革命的上海大学，真好像雄鹰从樊笼里飞到广阔的天空！他不知疲倦地学习、钻研马列主义，积极参加各种活动和斗争，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有了很大的提升。

1925年冬，党组织派他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简称“东方大学”“东大”）。十月革命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使李得钊受到很大的鼓舞。由于他擅长英语，俄语也学得很快，3个月，就一边学习一边担任翻译工作。1927年2月，李得钊离苏回国，受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委派，为东方大学招收学员。

3月初，李得钊前往武汉。此时，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已击溃了直系军阀吴佩孚、重挫孙传芳，基本控制南方各省，反帝反封建斗争取得了重大

胜利。但在北伐战争中实力增强的蒋介石也逐渐暴露了反革命的本性，形势急剧恶化。3月6日晚，在蒋介石的指使下，江西发生了一系列反共事件。为保护江西的党团组织和革命群众，并将其中符合条件的人员派往苏联学习，李得钊迅速赶往南昌。依靠组织，李得钊到处寻找刚刚躲过搜捕和屠杀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并组织他们秘密前往上海。4月12日，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随后，广州、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西、四川等地相继以“清党”为名，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全国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下。5月下旬，武汉陆续聚集了一万多名来自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省市遭到“清党”的共产党员，与党团组织失去联系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以及国民党左派和倾向共产党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等。7月15日，汪精卫叛变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持续了3年多的大革命失败了。李得钊根据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的指示，四处寻找逃难来此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他将包括9名永嘉籍青年在内的25名党员和团员分为几个小组，分别指定小组长并由组长带领组员，分批出发离开武汉秘密潜回上海，等

待与其他地区的留学生汇集。不久，七八十名留学生齐聚上海，化整为零分批赴苏联。9月初，李得钊来到广州。在党组织的帮助下，找到被通缉的、有被捕危险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组织他们秘密离开广州，先到上海分散隐蔽，然后再去莫斯科。反革命政变打乱了李得钊的招生计划，但他临危不惧、严谨细致、积极应变，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枪口下，尽最大力气保护了一批革命同志，为土地革命准备了一定的干部基础。

1927年底，李得钊从武汉回到上海，在党中央机关报《红旗》担任编辑，还兼做共青团中央的工作。他在《红旗》《列宁青年》等报刊上发表了许多文章，撰写的《文学革命与革命文学》一文曾在日本革命刊物上转载。他应《列宁青年》编辑部之约，为《列宁青年》纪念苏联十月革命胜利11周年专号撰写了3篇重要文章，分别是《列宁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十一年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苏联共产主义青年团概况》。1929年5月，李得钊在《列宁青年》第十六期发表了纪念五卅运动4周年的文章。在这些文章里，他深刻阐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歌颂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揭露和鞭挞了国民党反动派的

白色恐怖和残酷的屠杀政策。

1930年1月，李得钊的好友、中共中央巡视员金贯真回到浙南，负责加强温台地区党的领导、建立红军和开展土地革命。在此期间，李得钊对于家乡的革命斗争始终给予极大关注与支持，多次帮助金贯真等人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汇报浙南革命形势，商讨领导浙南农民暴动和建立红军等事宜。

5月20日，金贯真在温州壮烈牺牲。5月30日，李得钊怀着强烈的无产阶级感情写了一篇悼文，刊登在6月11日的党中央机关报《红旗》上。他写道：“贯真同志死了，永远离我们而去了。未死的我们在他被肢解了的、血淋淋的尸身前，没有悲哀，没有流泪的叹息，而只有复仇的决心！当我们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建立起全中国苏维埃政权的时候，就是我们替贯真同志以及其他许多死难的同志复仇雪恨的日子！我们发誓：血债要血还！我们深信：要他们还债的日子不会在遥远的将来的！”

8月，李得钊进入中央军委秘书处工作，成为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的得力助手，担负起中央军委繁重的日常工作。在红十三军的军事行动进入全盛时期之际，一批留苏学生回国到达上海，向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报到。

经李得钊提议，中央军委从报到学生中选派杨波、李立敬等5名军事干部到红十三军工作，充任军部参谋和教官。李得钊还对加强红十三军建设作出指示。根据中央军委指示，胡公冕从部队中抽出100多人建立直属教导队，由杨波、李立敬等人进行培训。

1931年，李得钊调到中央特科总务科工作，后又到中共上海中央局担任秘书处秘书长。1934年6月26日晚，李得钊等在上海中央局机关（上海马立斯新村）被捕，过了一个小时候左右，怀有身孕的李得钊爱人周惠年也在家里被捕。一个星期后，在组织的营救下，周惠年获释回家。李得钊被捕后化名林志明，坚不吐实，不久被移送到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

这年9月，周惠年分娩后才20天就被捕了，与她同时被捕的还有被她认作婆母的夏娘娘（烈士夏之栩的母亲、赵世炎的岳母）和李得钊的两个孩子（大的3岁、小的刚出生20天）。周惠年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还是坚持6月间被捕时的口供，说自己是一个不识字的妇女，问她什么事，都说不知道。但由于叛徒告密，敌人将她抓住不放。经审讯后，她被移送上海市公安局暂时关押。11月，她又被转押到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

当周惠年带着两个孩子和夏娘娘一起被送进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的号子时，李得钊正巧被囚禁在隔壁的号子里，他一听到周惠年和孩子们的声音，就说：“你也来了！”周惠年说：“我和孩子们都来了。”他们隔着墙壁，互相勉励，要做革命的硬骨头。当天晚上，李得钊就被调到别的号子里去了。

李得钊在狱中一次又一次地遭受严刑拷打，虽有叛徒指证，但他态度坚定、拒不承认。从被捕时起，他就决心用自己的生命来捍卫党的机密。他拒绝回答法官提出的一切问题，对法官说：“你们要杀就杀，何必多问！”有一个法官是浙江人，他以同乡名义向李得钊劝诱说：“登个记，办个自新手续，这是潮流。你何苦如此？”李得钊斩钉截铁地说：“我没有什么好登记的，我决不做对不起朋友的蠢事。”又说：“我的肺病，已经到了第三期，命是不会长的，你们要杀就杀，如果现在就死更痛快。”他每天早上起来后，就端端正正地穿好服装，梳好头发，准备着就义。他搞到了纸笔，给父亲寄了封“绝命书”。李得钊在这封信中述说了自己革命的志向和被捕后宁死不屈的决心；又回顾往事，说自己6岁丧母，

赖父亲千辛万苦将他抚养成人，父亲现又得抚养年仅几岁的孤儿，一生处境如此悲惨，实常人所罕有；最后望父亲心情开朗，切莫过度悲伤。光明来临，已为期不远……他向同监的难友、同志述说他爱人周惠年的境况，请他们对她和孩子的生活多加照料。

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刘顺元在回忆李得钊这段经历时写道：在宪兵司令部的看守所里，人们都很钦佩李得钊的革命气节。我一进监狱就知道，李得钊是整个牢房里最坚强、表现最好的共产党员。李得钊的表现，确实使我们党的威信更高了。他坚持斗争，不自首，不但使普通“犯人”佩服他，就连有的法官也佩服他……他是一位最好的共产党员！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说明了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

1935年8月，李得钊被判了15年徒刑。判刑后，他从宪兵司令部看守所被移送至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周惠年和夏娘娘一起被移送至苏州反省院。

李得钊在狱中天天学习，准备着将来出狱可以为党做更多的工作。他在囚室里写了一首抒情诗——《烦闷》。在这首诗里，曲折地描述了他忧国忧民的心情，表达了他同象征黑暗势力的“烦闷”“铁索”“利刃”

斗争到底的决心，他在这首诗的最后一段写道：

利刃哟，铁索呀！

几时我有了能力，

定要把你们捉住。

然后一起投在洪炉里，

铸成座小小的生命胜利的纪念塔。

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号称“天牢”，这里监禁的是被国民党反动派认为有重罪的军事犯和政治犯。在这座人挤人的“天牢”里，李得钊和难友只能轮流睡觉，吃的是三层饭（烂米、稗子、砂子）和烂菜汤，想喝水也很困难。李得钊刑伤累累，肺结核病又得不到应有的治疗。关在他隔壁号子的刘顺元看他身体越来越不行，很为他担忧，有一次掏钱买了8包澳大利亚进口的“代乳粉”送给他吃。李得钊身体发烧，草菅人命的狱医只是给他连续服用剂量过重的金鸡纳霜。1936年9月，李得钊终于被折磨致死，年仅30岁。

中央档案馆存有廖华为李得钊写的“简略”，其末段写道：“得钊同志性情和蔼，精通英文，有翻译多种，惜其书不传。”

解放后，李得钊的大儿子李海燕上书政务院，周恩来总理复示说：李得钊同志是一位很好的同志，为革命

事业牺牲了生命……关于追认烈士的事，已函告华东军政委员会，请陈毅同志办理。

1951年5月17日，华东军政委员会颁发了烈士证书（00329号）。政务院还通知浙江省人民政府，将李海燕保送浙江师范学院学习。李得钊的次子，出生20天即随母入狱，过着非人的生活，难友呼之为“囚童”，狱卒骂他为“小共产”。为纪念李得钊，周惠年将他改名为李钊，表示对他父亲的怀念，并激励他继承父亲遗志，做一个革命接班人。

李得钊烈士的遗像、遗作及其

革命事迹，陈列在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他的革命精神将永远鼓舞后人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注释：

①有资料称，李得钊于1924年冬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但根据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收藏的档案资料显示，李得钊于1925年3月加入青年团，同年12月底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时并未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文章来源：《浙南百名英烈传》）

（上接第24页）

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四个大的历史时期，以时间为经、事件为纬，纵横陈，客观记载百年来温州地方党组织结合地区工作实际贯彻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实现党在每个时期、每个阶段的战略任务所发生的大事、要事、新事，全面展现地方党组织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方面所发生的重要变化和取得的主要成就。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浙南百名英烈传》《温州百年百事》《温州百年大事记》的公开出版发行，为激励广大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提供红色教材，也为温州续写创新史、走好共富路，打造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市域样板凝聚奋勇前进的精神力量。

编者按：温州好，别是一乾坤。温州是一座文脉深广、文气充沛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优秀的文化传统是温州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最根本的源动力。为充分展示瓯越大地百年红色文化和千年历史脉络，打造党史学习教育新阵地，《温州史志》从本期开始，特开辟【志说温州】专栏，让读者领略源远流长瓯越文明与新时代温州人精神交相辉映的文化温州。

雁山瓯水 温润之州

◇ 中共温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温州古称瓯，因气候温和而得名，是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森林城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温州地处中国黄金海岸线中段、浙江省东南部，历史上以手工业、造船业发达著称，现代是民营经济的发源地，为浙南经济中心，1984年被国务院列为进一步对外开放的14个沿海城市之一，是浙江省三大中心城市之一。

全境介于地

理坐标北纬 $27^{\circ} 03' \sim 28^{\circ} 36'$ 、东经 $119^{\circ} 37' \sim 121^{\circ} 18'$ 之间。东濒东海，南与福建省宁德地区的福鼎、柘荣、寿宁三县（市）毗邻，西北部与丽水市的缙云、青田、景宁三县相



温州市地图



温州数学家名人纪念馆

连，东北部与台州市的仙居、黄岩、温岭、玉环四县（市）接壤。陆域面积12110平方公里，海域面积8649平方公里，现辖鹿城、龙湾、瓯海、洞头4个区，乐清、瑞安、龙港3个县级市，永嘉、文成、平阳、泰顺、苍南5个县。2019年，温州户籍人口832.4万人，常住人口930万人。全市地区生产总值6606.1亿元，增长8.2%，GDP总量比上年提升5位、升至全国第30位。

温州市地处中亚热带南部亚热带南缘，属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气候温暖、雨量充沛、光照丰富、四季

分明。境内地势从西南向东北呈现梯形倾斜，绵亘有洞宫、括苍、雁荡诸山脉，山地面积9212平方公里。泰顺县的白云尖，海拔1611米，为全市最高峰。温州地区水系发达，浙江省八大水系中温州占其三，瓯江、飞云江、鳌江三大水系贯穿境内，流域面积2298平方公里，河道总长2000多公里。温瑞塘河沟通瓯江和飞云江，自古是温州贯穿南北的水上交通主干道。

温州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从东瓯王都城开始，迄今已有2200多

年建城史。历史上，中原文化、海洋文化、山地文化、移民文化等交汇交融，形成了独特的瓯越文化。其中，南宋时期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主张“义利并举”“以义为重”的事功思想，成为温州思想文化的主脉。温州是中国山水诗的发祥地、中国南戏的故乡、中国重商经济学派的发源地、中国数学家的摇篮，近百年来涌现了苏步青、谷超豪、姜立夫等200多位数学家和数学教授。温州具有光荣革命传统，早在1924年就建立了中共温州独立支部，1939年中共浙江省第

一次代表大会在平阳召开。

温州素有“商”的传统，南宋时即被辟为对外通商口岸。改革开放以来，温州率先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创造了生机勃勃的经济发展模式——“温州模式”，成为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开路先锋。凭借“小商品、大市场”的创新经济理念，温州构筑了遍布全世界的“温商”网络，创造了许多“中国第一”，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的发源地之一。温州民营企业数量、工业产值、外贸出口、新增就业人数等均占全市总量的95%以上，现有在



乐清雁荡山景区

(余孝筑/摄)



永嘉楠溪江景区

(徐时涛/摄)



中国诗之岛、世界古航标，中国四大名屿之一——江心屿

(郑高华/摄)

册市场主体105万户。得益于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全市已建成“中国电器之都”“中国鞋都”等46个全国性生产基地，先后获得全国质量强市示范城市、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等称号。温州人商行天下，有68.8万人在世界各地、175万人在全国各地创业发展，建立了覆盖全国、连接世界的温商网络。

温州旅游资源极为丰富，“东瓯山水甲江南”，集山、江、海、

湖、岛、泉之大成，旅游景区面积占国土面积约四分之一，森林覆盖率达60%。拥有1个世界地质公园、2个世界遗产候选单位、3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2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5个国家级森林公园。其中，3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有被誉为“海上名山、寰中绝胜”的雁荡山，号称“永远的山水诗、最美的桃花源”的楠溪江，以及峰险洞幽的百丈漈。

编者按：一篇篇对温州饱含深情的诗词，一个个与温州无法割舍的诗人，每每想到，都不禁让人心往神驰。“诗意温州”栏目自开设以来，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和关注，“温州史志”期刊秉承“存史、资政、育人”的办刊宗旨，为大家提供一个交流探讨的平台，让思想在此碰撞，让观点在此互鉴，让学识在此成长。

孟楼还是浩然楼？

◇ 尤豆豆

在江心屿这方美丽的孤岛上，有一处阁楼一次次被诗人吟诵。然而在诗人的笔下，它有时被称为浩然楼、有时被称为孟楼……那么这座阁楼纪念的究竟是南宋文学家文天祥的浩然正气，还是唐代著名的山水田园派诗人孟浩然？这座“诗之楼”因何而来？到底叫什么名字？

明代万历年间始建

明代刘东星所作的《新建浩然楼记》中，详细记载了江心屿浩然楼的“诞生年份”和“身世”。据记载，浩然楼的建造时间为明代万历八年（1580）冬至次年正月，建在文天祥祠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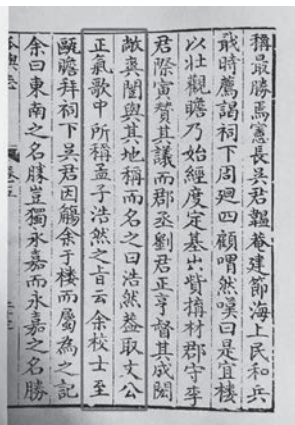
“（文相）祠前有地若干步，俯瞰江流，尤旷绝可喜。宪长吴君……喟然叹曰：‘是宜楼以壮观瞻。’乃始经度定基、出赀构材。郡守李际寅赞其议，而郡丞刘君正亨督其成……”

明代万历年间，兵宪吴自新发现文相祠前有一片空地，视野绝佳、尤其适合俯瞰江流，于是领着一帮同事出钱出人又出力，在此盖了一座宽敞开阔的楼，起名“浩然楼”，取的正是文天祥在《正气歌》中点赞的孟子“浩然之旨”。“宏敞爽闇，与其地称，而名之曰浩然。盖取文公《正气歌》中所称赞孟子浩然之旨云。”

浩然楼始建于万历八年，十多年后，王光蕴编撰的《江心志》成书。



浩然楼

刘东星的《新建浩然楼记》
记载了浩然楼名字的由来

据《江心志》记载，浩然楼四壁上曾悬挂文天祥的《正气歌》。

浩然楼，在文公祠前……仍揭书《正气歌》于四壁。

——《江心志·卷一·纪迹》

读懂了文天祥，读懂了《正气歌》，才能真正读懂浩然楼的来历。

“此浩然非彼浩然”

在《新建浩然楼记》的开篇，刘东星将孤屿比拟成“屹然不移”的“忠臣义士”。因为孤屿曾经见证文天祥的一片丹心。

不同于谢灵运时期的“乱流趋正绝，孤屿媚中川”，作为山水诗祖庭的江心屿在经历宋元之变后，画风猛

然一变，成为“慷慨激昂”的忠义之岛！滚滚瓯江中的孤屿，从此不仅仅是空灵清远的世外桃源，也成了屹立不倒、英勇孤绝的象征。文天祥的到来给孤屿抹上了悲情的色彩。

文天祥（1236—1282），吉州庐陵人，20岁时考中状元。南宋朝廷投降元朝后，文天祥从元军中逃脱，一路南下投奔益王赵昺与广王赵昺的流亡政权。

“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

德祐二年（1276）四月八日，文天祥从海道抵达温州。此时，两王已经南下福建。文天祥在江心寺的墙壁上，挥笔写下了著名的诗篇《北归宿中川寺》。

北归宿中川寺

（宋）文天祥

万里风霜鬓已丝，飘零回首壮心悲。
罗浮山下雪来未？扬子江心月照谁。
只谓虎头非贵相，不图羝乳有归期。
乘潮一到中川寺，暗度中兴第二碑。

文天祥离开温州后坚持抗元，再次被元军俘虏，押解到大都（今北京）囚禁。被囚二年，身体无恙。他认为这是由于自己身怀孟子所说的那种“浩然正气”，抵御了各种邪气，因此写下了《正气歌》。“浩然之气”是孟子首倡的概念，形容一种浩大刚正的精神。

……而予以孱弱，俯仰其间，於兹二年矣。幸而无恙，是殆有养致然尔。然亦安知所养何哉？孟子曰：“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彼气有七，吾气有一，以一敌七，吾何患焉！况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气也，作正气歌一首。——文天祥《正气歌序》

元至元十九年（1282），文天祥拒绝了忽必烈的最后一次劝降，从容就义。正如他所写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的一片丹心被载入史册，被后世传颂。两百年后的明代成化年间，孤屿续写

与文天祥的缘分。永嘉知县刘逊，文天祥的同乡，在江心屿为先贤树起一座祠堂：宋文丞相祠（今宋文信国公祠）。不久后，文祠前盖起了浩然楼，纪念的是文天祥和他的浩然正气。此时的浩然楼和孟浩然并无关联。

浩然楼

梅调元

百尺层楼冠巨鳌，文公曾此驻旌旄。
厓山事去家何在？孤屿潮生塔自高。
魄化杜鹃啼夜月，身骑白马蹴秋涛。
凭栏一望忠魂杳，天地茫茫首重搔。

《新建浩然楼记》中写道：东南之名胜岂独永嘉？而永嘉之名胜岂独一孤屿哉？惟文山公成仁取义，不以颠沛流离易志。此其大节挺立，名与天壤俱留。故所过之地，山增高而江增深……名以浩然，不亦称情乎哉！登斯楼也，俯仰乎江山之秀而想见文山公之忠义，则烈烈轰轰之气，当有不亡者存。

东南的名胜并非只有永嘉，永嘉的名胜并非只有孤屿，但因为文天祥的驻留，令孤屿增色！吴自新等人出资建立浩然楼，不光是为了让游人赏景玩乐，更有一种以文天祥的正气教

化世人的深意在其中。

浩然楼为何更名孟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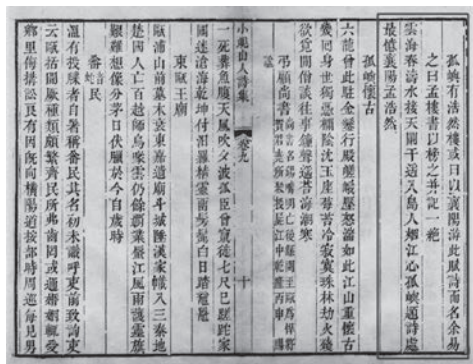
乾隆五十九年（1794），浙江温州处道秦瀛将浩然楼更名为“孟楼”，还张榜广而告之。理由是浩然楼纪念的是曾到此一游的唐朝诗人孟浩然。“前贤名不宜名楼”，于是改为孟楼。

孤屿有浩然楼或曰以襄阳游此赋诗而名，余易之曰孟楼，书以榜之并记一绝。

云海春涛水接天，阑干遥入岛人烟。

江心孤屿题诗处，最忆襄阳孟浩然。

这位行政长官的操作，让许多文人看不懂了，纷纷赋诗为浩然楼辩白，为文天祥“抱不平”。



秦瀛的《孤屿怀古》据《小岙山人诗文集》卷九

谒文信国祠（节选）

张振夔

龙翔此地曾回驭，鯢徙何方竟覆舟。
寄语祠中瞻仰客，出祠应上浩然楼。

浩然楼

丁立诚

忠义浩然气，实状文文山。
岂借孟夫子，点缀楼台间。

浩然楼

王书升

江心峙危楼，悬书曰浩然。
文山之正气，万古凌苍烟。
命名盖以此，岂为襄阳子。
拙哉采凤人，不学何乃尔。
濡毫更孟楼，题字惊东瓯。
淹没黄冠迹，江潮咽怒流。

光绪年间的诗人王书升更是发问：改名孟楼的无知举动真是惊动温州城！为何如此简单粗暴地抹去了文天祥的痕迹，滚滚瓯江愤愤不平。

那始作俑者秦瀛真的如此无知昏庸吗？事实其实恰恰相反！秦瀛（1743-1821），字凌沧，号小岙，出身于科举兴盛的江苏无锡秦氏家族。他是乾嘉时期的治世能臣和颇有声名的诗人。乾隆五十八年（1793），秦

瀛从中央调到地方，出任浙江温州兵备道，自此开始了十余年的外任生涯。他在温州为官期间，勤政爱民，老百姓感念他的功德，曾在孤屿树立他的石像。更让人玩味的是，孟楼更名的当年，秦瀛曾两度拜谒文天祥祠，刻文天祥像，并赋诗一首。据传，秦瀛还为文祠留联：“杜宇声寒柴市一腔留热血，梅花梦断瓯江千载泣忠魂”。宋文信国公祠中的碑刻曾遭毁坏，如今仅存秦瀛的《宋文信国公造像题记》碑。

江心寺文信国祠

秦瀛

飘零丞相历艰辛，丝鬓风霜老战尘。
南渡山川余一旅，中原天地识三仁。
誓登祖逖江边棹，愤激田横岛上人。
却望西台更萧瑟，杜鹃啼罢六陵春。

由此可见，耿直清廉的秦瀛对文天祥是非常敬仰的，以他的学识涵养，应该是非常清楚浩然楼与文天祥的关系。但秦瀛为何大张旗鼓地将浩然楼与孟浩然搭边？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或许和当时高压的政治氛围有关。清代文字狱在乾隆年间达到巅峰，定案数量远多于顺治、康熙、雍正三朝之和。清代志书中，为了避

嫌，把江心寺的开山鼻祖清了禅师写作“青了”禅师。

秦瀛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开始入朝为官，任内阁中书，后来入职军机处。从34岁到51岁，除去守孝的3年，秦瀛当了15年的京官，深谙乾隆皇帝的喜好和政治风向。虽然乾隆皇帝已经坐稳皇位，但清朝统治者仍然敏感于“华夷之辩”。文天祥毕竟是反抗异族统治的汉人英雄。或许是出于这样的考虑，秦瀛宁可顶住骂名，还是给浩然楼改了名。用孟浩然的诗名掩去文天祥的正气，这样的移花接木不失为对浩然楼的一种保护。

一楼千古两诗人

更名后，还形成了江心十景之一的“孟楼潮韵”。文人留下的诗篇，也逐渐被带“跑偏”了，从凭吊文天祥到追忆孟浩然。

登江心孟楼

（清）陈虬

秋色晚苍苍，江楼望眼忙。
山河雄两界，岛屿屹三唐。
日落潮声急，林孤塔影凉。
高风今已渺，去矣孟襄阳。

尽管更名为孟楼，但还是有识之士看出了端倪。梁章钜这首《孟楼》中，同时提到了孟浩然和文天祥。梁章钜是进士出身的显宦，受乾嘉学风影响，平生考据成癖。此诗作于嘉庆九年（1804）秋梁章钜初游温州时，诗的内容比较独特，既非刻画风景，亦非吊古咏史，而是为楼名作考证。

孟楼

梁章钜

凭栏泼眼尽秋光，城树村烟俯莽苍。
历览敢希谢康乐，标题漫借孟襄阳。
江山如此清辉在，人物当年逝水忙。
谁识浩然留正气，西偏丞相有祠堂。

诗人登楼远眺，满眼城树村烟。但他并未进一步铺排景物。颌联“标题漫借孟襄阳”一句，点出将浩然楼改为孟楼的不妥。一个“漫”字，表明了诗人的态度。颈联“江山如此清辉在”，貌似闲笔，实则暗藏玄机。“清辉”二字语意双关，表面似说山河秀丽，水木清华，但因宋高宗曾为江心寺题写过“清辉”榜额，诗人借此暗度陈仓，将浩然楼的历史拉到了

南宋，从而否定了与唐代诗人孟浩然的关系。尾联再从孟楼毗邻文公祠来作论证，使人顿悟“浩然”楼名乃取自文天祥《正气歌》，而非借用孟浩然的名字。对这种更名的做法，梁章钜并不赞同。他在诗之前有序曰：

“（孟楼）在江心寺西偏。考东瓯旧志，本名浩然楼。寺僧相传为孟襄阳遗迹，秦小岍观察因改题孟楼，并镌跋于石。……楼之西为文公祠，盖信国公流寓旧址。拜瞻遗像，正气如生，始恍然于浩然之名，实寄尚友之慨，与襄阳不相涉。观察跋语似未深考，因私辨之而系以诗。”

直到清代末期，孟楼的提法才退出历史舞台。据《孤屿明灯录》：

“清光绪元年（1875）（孟楼）重建时，恢复浩然楼旧名。”直到今天，浩然楼还是被叫做浩然楼。

清代李宗昉撰的名联“青山横郭白水绕城孤屿大江双塔院，初日芙蓉晓风杨柳一楼千古两诗人”，至今悬挂在浩然楼。从文天祥到孟浩然，历史用了—个美丽的误会，丰富了浩然楼的诗歌内涵，从此“—楼千古两诗人”。

（作者单位：温州都市报）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
 彻。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
 千秋功罪，谁曾许？如今我谓是，命不要这高，只要这多。雷安
 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
 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毛泽东念如《念奴娇·昆仑》
 辛丑年陈祖楼书

毛泽东《念奴娇·昆仑》 陈祖楼书

